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致敬未来：IFF 20周年特别致辞

全球新格局、新挑战

发展中国家：机遇与挑战

全球经济“碎片化”：影响与应对

气候变化应对与可持续发展



2024年第2期 总第4期

ISSN 2960 - 1452



9 772960 145503



IFF20TH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新资本 新价值 新世界

NEW CAPITAL NEW VALUE NEW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国际金融论坛》杂志
国际刊号: 2960-1452

主办单位
国际金融论坛 (IFF)
U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D: AA2980

大会主席团
韩升洙 珍妮·希普利 周小川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陈茂波 梁锦松 冯慧兰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埃里克·索尔海姆 韦浩思 易小准

理事会
韩升洙 珍妮·希普利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陈茂波
梁锦松 冯慧兰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埃里克·索尔海姆
韦浩思 易小准 祝宪 林建海 戴青丽 格里·赖斯
悉达多·蒂瓦里 周汉民 周延礼 梁维特 阿罗约
埃内斯托·塞迪略 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洛朗·法比尤斯
凯拉特·克林姆别托夫 让·克洛德·特里谢 苏丹·本·纳赛尔·苏瓦迪
安雅山 史蒂芬·格罗夫 弗兰克·里斯伯曼 大卫·赖特
布莱恩·佩斯科 中尾武彦 维拉·松圭 扎法尔·乌丁·马赫默德
魏伯昂 李彤 容永祺 叶兆佳 马志刚 萧志伟 李纪珠 张继中

出版人
张继中

编委会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悉达多·蒂瓦里 扎法尔·乌丁·马赫默德
聂庆平 宋敏 迟计
宾度·罗哈尼 庄巨忠
吕学都 李俊峰 夏乐

主编
张继中 林建海 祝宪
宋敏 迟计 吕学都

执行主编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明珠开发大厦 22 楼

邮编
511458

Email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www.ifforum.org

版权声明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独家拥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或摘抄。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自 2003 年成立以来,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和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组织的各类交流合作、学术研究等活动, 在不断贡献其智慧与真知灼见的同时, 也打造了 IFF “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 的国际一流学术智库。为了让更多读者及时了解 IFF 学术智库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们不遗余力地汇总分析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信息、数据和趋势, 通过精心编辑和深入解读, 努力为读者全方位呈现全球经济金融的现状与未来走向。

2023 年 10 月,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在广州南沙新落成的 IFF 永久会址举行了 IFF20 周年全球年会。这场全球金融盛会以“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 全球经济碎片化下的重振与合作”为主题, 旨在汇聚全球智慧、共议应对当今复杂经济形势的战略与路径。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位政府高层、国际组织首脑、全球财经领袖, 以及各届代表 2600 余人齐聚一堂, 就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经济、金融、贸易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为延续年会的精神内涵与智慧成果, 本期刊精选、精编 IFF20 周年全球年会主旨发言 36 篇, 聚焦全球新格局新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经济“碎片化”、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金融及资本市场、数字化转型与普惠金融以及“一带一路”、中国民营经济、粤港澳大湾区 9 大主题, 以期通过辑录这些见解深刻、论点鲜明的文章, 启发深度思考, 共谋助力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



张继中
CEO / 联合创始人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 (IFF)



NEW CAPITAL NEW VALUE
NEW WORLD

新资本 新价值 新世界

全球金融 F20 金融服务世界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关于 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 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和地区、新兴经济体, 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及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 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 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 (IFF) 从创立至今, 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 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 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 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 — 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 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 (IFF) 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 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 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 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 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期杂志稿件主要来源于 IFF2023 年全球年会, 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 特此说明。

CONTENTS

目录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4 期



14

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对国际经济和金融至关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当今世界重大的综合发展规划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完成建设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湾区, 而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位于这个湾区的中心。在大湾区中心, 将建设一个国际金融岛并开展各类金融活动。许多中国和国际的金融机构将落户国际金融岛, 致力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金融中心之一。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与国际金融岛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

8 / 致敬未来: IFF 20 周年特别致辞

- 周小川: 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应捍卫“多边主义” 9
- 王伟中: 开放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10
- 李家超: 香港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合作 12
- 韩升洙: 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对国际经济和金融至关重要 14
-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 20 周年 17

18 / 全球新格局、新挑战

- 阿罗约: 根据本国国情量身定制政策 19
- 马苏德·艾哈迈德: 加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冲突与危机 21
- IFF 研究院: 《IFF2023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 23

25 / 发展中国家: 机遇与挑战

- 张燕生: 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及前景 26
- 薇拉·松圭: 开放市场、加强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29
- 若阿金·莱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几点共性问题 31





17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 20 周年

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体系只有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情况，才能应对现在复杂的挑战，才能防止分裂、重建信任并为其他结构性改革，包括加强金融安全网和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铺平道路。

我期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金融论坛 (IFF) 能为创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33 / 全球经济“碎片化”：影响与应对

- 珍妮·希普利：国际机构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34
- 易小准：加强多边合作，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36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全球经济“碎片化”下的贸易、供应链及产业政策 38
- 哈罗德·詹姆斯：“碎片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的前景 40

42 / 气候变化应对与可持续发展

- 周小川：法规和激励机制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43
- 吕学都：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及中国的实践与挑战 46
- 戴青丽：加大碳减排投入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48
- 埃里克·索尔海姆：私营部门和全球碳市场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 50
- 王信：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52

54 / 金融及资本市场：稳定与风险

- 魏伯昂：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思路与前瞻 55
- 布莱恩·佩斯科：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和债券市场情况分析 57
- 林建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需要关注合法性、可行性与相关性 59



84 / 数字化转型与普惠金融

- 李东荣：数字化转型有效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85
- 亚历山大·通比尼：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 88
- 安顿·马斯凯特里爵士：数字金融变革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89

61 / “一带一路”：经验、挑战与机遇

- 周建：“一带一路”十年总结及展望 62
- 克林姆别托夫：哈萨克斯坦致力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64
- 雷扎·巴基尔：“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发展中国家 66

68 / 中国民营经济：创新与前景

- 吴晓青：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69
-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重视民营经济，实现全面繁荣 72
- 余向荣：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振信心 73

76 /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 黄奇帆：生产性服务业与粤港澳高质量发展 77
- 梁维特：“湾区标准”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80
- 叶兆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背景下的澳门定位及发展方向 82

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 应捍卫“多边主义”

■ 周小川 / IFF联合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

2023年是国际金融论坛（IFF）成立20周年，20年来IFF主动发挥自身国际性常设对话机制作用，积极推动全球经济金融重大议题的沟通与交流，在促进国际金融界交流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

当前，受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军事冲突、通胀形势、国际债务以及产业链重组等多重风险叠加的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远低于2000年至2019年期间3.8%的平均水平。其他国际机构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同样较低，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是2.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则是2.7%。与此同时，全球通胀升速虽有所减缓，

但核心通胀黏性较强，下降速度缓慢，IMF预测2023年全球通胀水平将从2022年的8.7%降至6.8%，但大多数国家的通胀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回落到央行目标水平。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或将在较长时间内依然维持较高利率，全球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面对当前经济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应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捍卫多边主义，避免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和经济胁迫。要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避免滥用国家安全理由限制贸易和投资。应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充分利用好区域合作机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的新趋势，积极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要加强各国的宏观政策、金融和监管政策方面的协调，避免单边主义和单边制裁造成新的失衡，尤其是要把控好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外溢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重冲击。要聚焦多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绿色发展、供应链等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历史反复证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因此，我们要学会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家贸易和投资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最后，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继续秉持一贯宗旨，进一步积极作为，真正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助力粤港澳协同，面向世界的新型国际交流平台，为中国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重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包容及全面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致敬未来：IFF 20 周年特别致辞

面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应捍卫“多边主义” 周小川，IFF联合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9
开放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王伟中，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10
香港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 李家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2
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对国际经济和金融至关重要 韩升洙，IFF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14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IFF）成立20周年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	17

开放合作 才能互利共赢

■ 王伟中 /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王伟中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创立 20 年来, 积极开展全球金融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合作, 已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金融公共智库和战略平台。当前,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世界经济形势, 我们需要促进国际社会加强对话、积极应对、共同合作、促进发展。

广东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 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 强化经济大省勇挑大梁

的责任, 攻坚克难、拼搏奋进, 推动经济在固本培元中稳步恢复向好,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们坚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 以制造业当家, 积极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 已形成 8 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8 年位居全国第一,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连续 3 年位居全球第二。

我们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提信心、促发展的政策举措。2022 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9 万亿元, 连续 34 年位居全国第一。2023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长 4.5%, 特别是工业投资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9 月份增长 24%。全省市场主体和企业数量仍在快速增长, 总量分别超过 1760 万户和 760 万户, 广东企业总数占中国的 1/4。

我们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累计引进外资项目 31 万个, 实际利用外资 5600 亿美元,

世界 500 强企业有 350 家在广东投资, 广东已成为中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22 年, 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8.3 万亿元, 占全国的 1/5, 2023 年前三季度, 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1330 亿元; 8 月, 外贸增长 10.2%; 9 月, 顶压前行, 三季度当季增长 2.4%, 外贸外资平稳向好。

国家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 先后出台大湾区、横琴、前海金融发展三个“30 条”政策, 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 等外币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跨境车险等效先认等试点落地实施, 粤港澳三地金融互联互通扎实推进。



广东是金融大省, 金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1/3, 银行存贷款余额、上市公司数量、保费收入等均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 国家大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 先后出台大湾区、横琴、前海金融发展三个“30 条”政策, 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 等外币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跨境车险等效先认等试点落地实施, 粤港澳三地金融互联互通扎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2023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5 周年, 广东的发展, 大湾区的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2023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五次亲临广东视察, 殷切期望广东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 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地的全新定位。

当前, 广东正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 锚定走在前列的总目标, 着力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 奋力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坚持制造业当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推动共同富裕, 推进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我们将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将为世界各国朋友来粤投资兴业、合作发展提供丰富资源和广阔空间。

开放合作才能互利共赢。10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广东愿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 持续深化经济、金融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积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香港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合作

■ 李家超 /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

2023 年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年会的主题是“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全球经济碎片化下的重振与合作”。该主题有两大重点。第一点是“新”，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各国的策略方向、各地资本市场的趋势，还是金融业的重点发展都面临转变，如何应对新挑战、把握新机遇，成为国际性的新议题、新热点。第二点是“合作”，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

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向来

提倡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深信合作共赢。全球经济重心将继续东移，亚洲经济腾飞已进入黄金时期，趁此良机，香港正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特区政府将积极推动香港在促进国家金融改革开放、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下，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汇聚中国优势和环球优势的城市，向来发挥着连通内地和世界的桥梁角色，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获得国际广泛认同。2023年5月，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香港中心，这充分展现了 IFF 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信心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将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10月25日，我在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为了刺激股票市场蓬勃发展，香港将下调股票印花税和市场资讯费用，检讨股票的买卖价差，改革中小企业的 GEM 股票市场等，同时将继续紧贴市场的变化，就上市平台、市场结构、交易机制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等方面，研究进一步的中长期策略，引领市场持续发展。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将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促进香港股票的人民币计价交易，同时推动落实离岸国债期货的措施，并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粤港澳大湾区结合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个城市，总人口超过8600万，经济总量超过19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香港将全力深化粤港



大湾区的金融合作，与内地金融市场连通，继续善用前海合作区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包括推动香港基金业参与内地的私募股权投资，并在2024年上半年与深圳共同设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推动港深金融高水平合作。

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方面，香港将推出资助计划，支持绿色金融科技的概念验证测试，推动开发科技方案，计划将为绿色金融科技项目提供商业化发展前的资助，拓展绿色金融科技的生态圈，打造香港成为绿色金融科技枢纽。

香港将继续善用自身所长，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对国际经济和金融至关重要

■ 韩升洙 / IFF 联合主席、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韩升洙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当今世界重大的综合发展规划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完成建设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湾区，而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位于这个湾区的中心。

广东省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并将成为先进技术和综合物流的中心。

在大湾区中心，将建设一个国际金融岛并开展各类金融活动。许多中国和国际的金融机构将落户国际金融岛，致力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金融中心之一。国际金融论坛 (IFF) 将与国际金融岛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全球经济受到了巨大影响。目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疫情后复苏的阶段，从多维度看，这种复苏揭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特征。

首先，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快速提高政策利率，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 2023 年和 2024 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为 3%，明显低于疫情前 20 年 3.3% ~ 4% 的年平均增速水平。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数字意味着外部需求将持续低迷。

其次，各行业的复苏存在明显差异。服务业的复苏方兴未艾，甚至在某些领域蓬勃发展，而制造业的复苏则明显滞后。对于中国、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密集型经济体来说，这种差异带来了挑战，而对于像美国这样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来说，似乎可以表现得更好。

第三，疫情的长期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对不同经济体产生的影响差别很大。许多发达经济体在调动资源支持其经济结构方面非常灵活，所以快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 GDP 水平；而许多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缺乏财政空间做出适当反应，疫情将给这些国家造成持久的经济损失，导致其经济前景黯淡，较长时间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 GDP 水平。

在应对疫情方面，中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别案例。中国经济在疫情的最初冲击中迅速恢复，到 2022 年初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挑战依然存在。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仅在放缓，而且经济预期也在下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受到长期结构性不利因素影响，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下降，中期经济增长预期已下调至 3.5% 以下，明显低于此前 4.5% 的经济增长预期，这意味着中国的

GDP 在中期内仍将持续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再看全球金融领域，银行业已经从对其行业经营状况的担忧中反弹，但仍面临利率上升和货币政策收紧的挑战。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正在通过收紧货币政策发出警告，表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存在。然而，市场似乎对通胀和终端利率的路径感到惊人的自满。这种不和谐导致过去几个月金融状况自相矛盾地放松，尽管政策利率仍在逐步提高。

2023 年早些时候，美国银行业和瑞士信贷银行出现的动荡已经通过当局的果断行动得到了改善。然而，高通胀货币环境仍将构成挑战，特别是对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讲。我们看到多个国家的房价下跌，抵押贷款融资成本上升，脆弱家庭面临更大的风险。

更高或更持久的通胀可能引发金融资产的快速重新定价，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进而加剧现有状况的脆弱性，并可能引发危机。因此，在这个关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金融稳定对国际社会将至关重要。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依赖信贷的增长模式遭遇了重重考验。直到 2021 年，中国的住房需求一直是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支撑土地和房价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金融工具在必要时救助负债的国企以推动投资。然而，自 2022 年以来，风向发生了变化。中国家庭对房产的信心开始下降，这将为长期的市场调整奠定基础，类似于过去二三十年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现的情况。这可能导致不利的宏观金融反馈循环，抵押品价值下降和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它还将加剧信用风险，特别是在中国债务水平较高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最近重新调整了政策重点，是对这些经济和金融挑战的实质性回应。

作为一项战略调整，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加强内需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控制金融风险。这涉及一系列全面行动，包括大力促进个人消费

和增强消费者信心，刺激住房需求，加大对优质房地产开发商的支持力度，以及鼓励高科技民营企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策转向也包括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扩大对国内外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2023 年的监管架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美国引入新的资产质量规则，收紧不良风险敞口的确认标准，并更新了重组资产的规定。此外，重新修订的资本规章制度也已到位，旨在通过基于风险敞口的基本规则施加差异化的风险权重，促使银行在风险承担行为中更加谨慎。和其他事项一起，这些变化填补了现有一些漏洞，迫使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以应对风险敞口，例如由未完工房产做的抵押贷款。

中国也对其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控制金融风险。比如，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CBIRC) 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人民银行 (PBC)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 的部分职能，组建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值得注意的是，省级办事处的权力已重新调整为中央权力。为此，关闭了省级金融政策办公室，限制了地方政府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自主权，从而提高了金融监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这些措施在减少监管套利空间和减轻地方干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地方干预迄今一直阻碍着薄弱地方银行的重组和地方政府金融工具 (LGFV) 对债务增长的控制。

然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即使是意图最良好的政策改革也充满了挑战和意想不到的结果。虽然中国最近的监管变革旨在遏制金融脆弱性，但变革过程中将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例如，中央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虽然至关重要，但也可能导致财政紧缩的风险，如果财政紧缩比预期更严重则可能使本已因房地产行业压力举步维艰的小型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雪上加霜。因此，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及政策引导对于企业渡过风险浪急的阶段至关重要。



如果研究一下美国银行业和瑞士信贷银行最近发生的动荡，就会发现仅仅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框架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解决潜在的结构脆弱性问题。就中国而言，这意味着要从导致债务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入手解决问题，这些驱动因素包括：快速增长目标、狭窄的地方税基以及对出让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监管机构应继续加强监管和风险监测，以便更好地应对不可预见的银行业压力事件。全面的努力必须超越银行部门，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纳入其中，这个领域较少为人所知，但同样容易受到流动性错配的影响。

另一个较少讨论但至关重要的领域是危机管理的体制结构。金融体系如今面临的新挑战，为重新审视和改革这一架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的危机管理工具包需要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要制定一项计划，而且要制定一项有效的动态计划，并辅以损失分配和处置资金的法律和运营安排，以便在任何金融机构面临压力时做出有效应对。此外，金

融当局应采取先发制人的宏观审慎措施，以缓冲新出现的风险。在市场紧张时期，流动性支持必须既迅速又有力，以限制传导，同时平衡始终存在的道德风险。

在当今这个经济和金融面临空前挑战的关键时刻，国际金融论坛 (IFF) 不仅要帮助适应，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塑造监管架构和政策工具包。无论是重新调整增长模式，还是对中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稳定框架进行必要的改革，关键在于采取先发制人的全面行动。

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 20 周年

■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我衷心祝贺国际金融论坛 (IFF) 成立 20 周年。在纪念这一里程碑之际，我们必须反思全球金融面临的紧迫挑战。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在遭受的日益严重的融资危机，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

在最近召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各国政府对我提出的“人类与地球拯救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表示了欢迎，该计划每年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5000 亿美元长期的、可负担的资金。

国际金融机构、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共同努力扩大发展气候融资规模，增加资本基础，改变多边开发银行的业务模式。我们必须确保债务减免机制有效运行，以便为有需要者提供紧急支持。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对功能失调、过时和不公正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体系只有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情况，才能应对现在复杂的挑战，才能防止分裂、重建信任并为其他结构性改革，包括加强金融安全网和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铺平道路。

我期待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金融论坛 (IFF) 能为创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本国国情 量身定制政策

■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 IFF理事、菲律宾前总统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2001年至2010年，在我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前期一直致力于一系列财政改革，后几年则主要应对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财政改革，其核心就是俗称的扩大增值税。所以，即使遭遇了令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全球金融危机，菲律宾因为实施了经济改革，仍然保持了经济增长。因而，我觉得选择正确的政策非常重要，而正确的政策就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量身定制的政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必须有效利用最佳的分析资料来制定良好的政策选项，从而获得最适合的国家策略。国际金融论坛（IFF）发布的《IFF2023年金融与发展报告》，能够给我们的抉择指明方向。

高通胀是目前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脆弱人群的影响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价值链萎缩18%左右。这个时刻我们亟需重建全球化，扭转逆全球化。根据菲律宾的一个统计数据，早在疫情之前，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商业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从38%降低到了29%。

全球化与菲律宾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俄罗斯宣布终止执行黑海倡议后，占全球大米出口40%的印度对非巴斯马蒂大米实施出口禁令，导致菲律宾的大米通胀率达到17.9%，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6.1%。同时，高利率也导致菲律宾比索疲软。这对高度依赖进口的菲律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美联储加息也是菲律宾通胀高企、比索贬值的原因之一。菲律宾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度较大，所以深受全球化影响。

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

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对世界影响巨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面需要缓解，保持沟通开放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对于菲律宾很重要，因为南海问题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点。缓和双方紧张局势的关键是最终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谅解。

科技的迅速进步和发展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尤其显著。近5年全球金融科技产业市场复合增长

全球新格局、新挑战

根据本国国情量身定制政策

格罗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IFF理事、菲律宾前总统

加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冲突与危机

马苏德·艾哈迈德，IFF顾问、全球发展中心主席

《IFF2023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

IFF研究院

19

21

23



率达到了 12.8%，所以监管政策和规则需随之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工智能和智能化等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替代人工劳动，加剧不平等和贫困。此外，高新技术人才和国家可能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这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该时期的技术革新是为了提高低技能人群的生产效率。

先进科技的应用，特别是像人工智能等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会对就业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菲律宾的一项实证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岗位的影响。该研究发现，25% 的就业岗位是中性的，即它们既不容易受到数字化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发生转型；但 31% 的就业岗位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28% 的岗位可能会遭遇破坏性的影响，这取决于该国引入或使用的自动化或技术类型，只有 5% 的岗位会在数字化的影响下发生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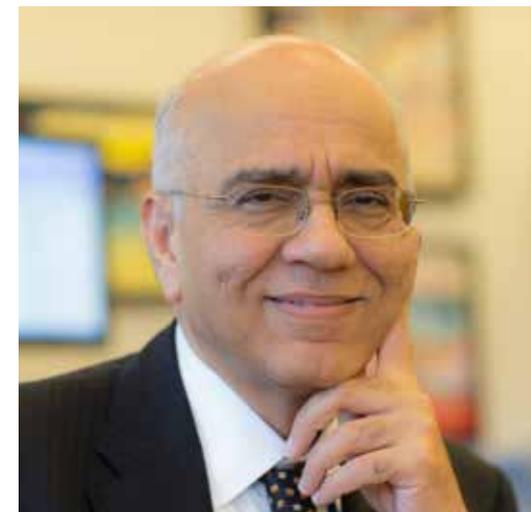
传统的金融体系可能已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应大力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菲律宾非常依赖大米，而气候变化对大米的生产影响巨大。菲律宾能够平安渡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避免了金融危机对大米生产的严重冲

击，是因为菲律宾大幅度提升了大米的产能。但未来几年，菲律宾不会再有这么幸运了，因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大米生产正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讨论了很多战略、政策，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都是空谈。所以，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执行层面，如果没有有效及时的执行，再好的战略也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我们有了《IFF2023 年金融与发展报告》这个非常好的分析框架，然后剩下的将由各国政府和企业来实施。

加强经济韧性 以应对冲突与危机

■ 马苏德·艾哈迈德 / IFF 顾问、全球发展中心主席



马苏德·艾哈迈德

不管欧美的通胀压力有多大程度是由供给侧和需求侧所推动的，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率都会相对较高。对新兴市场而言，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都会处于高位。新兴市场承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负债较高，利率上升，还债成本更高，且展期难度更大，因为债权人在本土市场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其次，美国经济出乎预料似乎颇有起色，而欧洲经济表现低于预期，中国经济在放缓。全球经济具有韧性，但步履艰难，并未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

我最关心的是绿色转型，尤其关注其在未来一两年的表现。绿色转型不但是现在，而且是未

来二三十年都非常重要的议题。促进绿色增长，将给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企业带来发展机遇。很多国家可能通过研发利用新技术，最终实现从依赖化石能源结构向更加便宜清洁的绿色能源结构转型。

然而，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担忧。比如，太阳能光伏板的成本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讲是便宜的，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是高昂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借贷和投资成本更高，这些项目需要非常高的前期资本投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行成本才会逐渐降低，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成本显然要高得多。

有些国家（发达国家）会更多考虑气候变化，而有些国家（低收入国家）更在乎的是获得能源，至于能源是否为绿色，是其次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在很多低收入国家，还有成百上千万人口的生活用电都无法保障。对这些人来讲，首先是要有电可用，至于发电的能源是否为绿色，绿色能源

的优越性以及能源的多样化发展这些议题，他们目前可能并没有那么关心。

其次，发展中国家还担忧他们能否在正确的时间里接触到新的技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

如何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帮助他们降低融资成本，投资于未来的绿色能源和经济，以及我们如何确保他们能在合适的时间获得正确的技术。因为历史证明，有时一项新技术诞生后，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而绿色能源转型需要在全世界实现，才能有效

有些国家（发达国家）会更多考虑气候变化，而有些国家（低收入国家）更在乎的是获得能源，至于能源是否为绿色，是其次要考虑的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

另外，没有人能想到今天中东的局面，就像之前没有人能预想到俄乌冲突的局面，还有疫情的冲击，人们也没有预料到。突发事件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巨大，我不知道下一次冲击何时会发生，但如果认为我们的一生中不会再遭遇第二次大疫情，或者说不会再遇到能够对经济运行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冲击，那就太愚蠢了。从国际体系角度讲，就是要让国际组织（机构）做好调整和准备，帮助各国加强经济韧性。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各国应对经济冲击，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导致应对宏观经济挑战和困难的能力也不均衡，IMF 可以通过一些项目帮助各国筹资、融资，获得急需使用的资金以应对经济问题。

如何应对疫情、战争或食品、能源危机造成的冲击？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帮助各国建立安全网，目前国际体系下的全球安全网络日益强大，可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各国应对外来冲击。我认为，未来工作的重心应是帮助

设计或者重新设计国际组织相关要素，以提高他们帮助各国应对冲击的能力。因此，国际组织（机构）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非常重要。

《IFF2023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

■ IFF 研究院



《IFF2023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的重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全球经济展望，二是全球经济前景存在的风险，三是全球政策重点。

一、全球经济展望

2022 年世界经济衰退之后，全球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主要因为俄乌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负面影响，制约了经济复苏。国际机构关于经济的共识是，202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为 3.1%，低于 2022 年 3.4% 的经济增长预期。发达国家 2023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1.5%，发展中经济体为 4.1%。预计 2023 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0%，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率为 80%。2024 年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状况持续收紧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保持在 3.1% 的疲软水平，其中发达国家预计增长 1.3%，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长 4.3%。

美国 2023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2%，稍低于 2022 年 2.1% 的增长预期。尽管货币政策急

剧收紧，美国经济到目前为止仍保持了韧性。预计 2024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0.8%。

欧盟经济 2023 年预计将增长 0.9%，2024 年预计将增长 1.5%，均低于 2022 年 3.7% 的经济增长预期。欧盟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由于高通胀和货币紧缩抑制了国内需求，持续的俄乌冲突也影响了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

中国经济 2023 年和 2024 年预计将分别增长 5.2% 和 5%。但由于家庭消费疲软、住房投资下降和出口萎缩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为了支持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接连出台政策措施以促进消费。

东盟经济 2023 年预计将增长 4.6%，2024 年预计将增长 4.9%，均低于 2022 年 5.7% 的经济增长预期。经济增长放缓有诸多因素，包括通胀上升、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对制成品出口需求的减弱。

在 2023 年货币政策收紧、全球增长放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以及全球供应状况持续改

善的背景下，全球的通胀有所放缓。目前市场的共识是，2023 年，全球通胀率将从 2022 年的 9.2% 降至 7.1%；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将从 2022 年的 7.3% 降至 4.6%；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将从 2022 年的 10.6% 降至 9.1%。

2024 年，由于若干原因，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放缓。预计 2024 年全球通胀率将降至 5.2%；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将从 4.6% 降至 2.7%；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将从 9.1% 降至 7.6%。

现在市场的共识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 (WB) 等国际组织都认为全球经济将能够实现软着陆，但是 2023 年、2024 年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疲软，并且通胀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二、全球经济前景存在的风险

全球经济前景存在几个下行风险，如果这些风险成为现实，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比预期的低，全球通胀可能会比预期的高，并且不能排除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

第一个风险是通胀的压力可能比预期的更加持久。因为核心通胀率下降缓慢，核心通胀可能非常顽固，就会导致整个通胀预期将会更加持久。另外，由于俄乌冲突、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升级，以及其他原因，包括央行过早结束了紧缩政策，导致通胀高企。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一些极端气候，影响到了全球粮食的生产，也推高了全球主要粮食和食品的价格。

第二个风险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更多的全球金融系统的承压，包括更多银行的倒闭。另外，资产市场重新定价，以及长期过度的紧缩货币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宏观挑战以及债务问题。以上金融困境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和加深。

第三个风险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地缘经济和金融分裂。众所周知，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中东冲突不断升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出现缓和迹象，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将会使更多经济政策被武器化。比如，更多国家开始通过打贸易战进行投资的筛选和限制高端技术的出口，还有制造业的回流等，这些都会产生对短期经济恢复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第四个风险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不及预期。中国主要的经济增长风险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困顿、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解决的迟缓，以及出口的疲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30%，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

三、全球政策重点

要缓和以上风险、促进短期经济恢复和长期经济增长，根据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四个全球政策重点。

(一) 继续遏制通货膨胀，同时保持金融稳定，实现全球经济的软着陆；

(二) 致力于重整公共财政，同时保护弱势群体；

(三) 加快结构性改革，消除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

(四) 加强国际合作，奉行多边主义应对共同挑战，包括减少贫困、保护环境和减缓气候变化、解决跨国冲突和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发展中国家：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及前景	26
张燕生, IFF 学术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	
开放市场、加强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29
维拉·松圭, IFF 理事、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全球流动性与可持续性贷款机制 (LSF) 主席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几点共性问题	31
若阿金·莱维, 巴西前财长、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巴西萨夫拉银行经济策略和市场关系总裁	

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及前景

■ 张燕生 / IFF 学术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



张燕生

从 202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会议，我们可以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作出判断。4 月 28 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也就是三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恢复，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和挑战。7 月 24 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主

要有三点：

第一，三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是我在基层调研的切身感受，也是一些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告诉我的。

第二，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困难不可低估。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是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发展工业经济，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当时我们问自己路在何方？今天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如何解决创新型经济、法治型经济、更高水平开放的国际化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我们仍要问自己未来的路在何方？

第三，新的国际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不可低估。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一直是在全球化国际环境中前行的，是在 IT 革命、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前行的，是在大国间可以通过合作共同构建相互依存的“地球村”的大背景下前行的。但是现在全球化的大环境、大背景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述三个“不可低估”，就是中国经济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这个角度

来讲，挑战不仅仅是短期、中期的，而且是长期的。

2023 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5.2%，国家统计局预测，中国经济第四季度增长只要能够达到

4.4%，全年经济就有望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经济 2022 年、2023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低于潜在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因此，2024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能否保持 5%，成为焦点话题，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意愿不足、大宗消费不振，地方资产负债修复困难，基建投资后续乏力，发展动能转换不平衡，以及出口下降、供应链外迁、股市汇市不稳，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

疫情三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是 2.8%，低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 4.3%。2023 年前三季度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 3.1%，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是 -9.1%，民间投资是 -0.6%，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速是 9.1%。

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困难和挑战是，外贸持续下行带来的稳外贸难度加大，中国的外贸亟需转型。影响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第一，外需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预测，2023 年货物贸易增长率是 0.8%，远低于 2022 年的 2.7%。

第二，地缘政治冲突。受地缘政治冲突，主

要是大国竞争及区域性冲突的影响，中国 2023 年前三个季度对美国、欧盟、日韩的出口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第三，稳外贸、稳外资。现在一些主要大国推动回岸制造再工业化，中国的企业通过“走出去”进入欧美投资，而他们的投资特点是通过互补型的投资带动贸易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外贸发展的关键是怎么推动稳外贸、稳外资。

总之，中国的外贸外资，无论是战略、政策还是结构，都需要实现转型升级，都需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

二、当前中国经济的机遇

(一) 一个重大机遇是中国正在进入新经济，它的动能是创新驱动旧经济加快转型升级。2022 年中国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 2.55%，投入的研发经费金额已经超过 3 万亿。

从研发强度看，中国有三个动能和发展阶段的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创新驱动板块，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 6 个省市，2022 年的研发强度都高于 3%，它的动能已经进入创

新驱动阶段；第二个板块是投资驱动板块，研发强度低于 3%，一共有 12 个省市。虽然第二板块的动能仍然是投资驱动，但其研发经费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例如：陕西 2021 年的研发强度是 2.35%，山东是 2.34%，安徽是 2.34%，湖北是 2.32%。因此，第二板块前几个省的动能已经开始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第三板块是资源驱动板块，一共有 13 个省市、自治区，它们一年投资创新的经费还不到广东省一年投入的一半。

因此，中国的发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针对科技创新的短板，中国正在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和科技体制三年攻坚计划，要把基础研究搞上去，把体制机制转变过来。

(二) 中国未来的发展核心是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 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是美国的 29.7%，2014 年上升到 40.3%。中国要提高 TFP，核心是要靠改革开放、要靠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开发、要靠技术进步。

中国在数字技术革命、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因此，“新三样”——电动车、光伏和锂电池已经成为中国贸易出口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三、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前景

中国在中短期内应该政策发力，改革开放发力，通过改革完善逆周期的调节，推动积极宏观调控的治理。从 2023 年四季度到 2024 年，中国应该尝试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积极的转型升级。

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当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其中以楼继伟为代表人物的观点主张扩大财政支出，即通过提升财政赤字、加大财政政策力度，推动中国经济短期企稳、中期结构性调整和长期改革。

我的观点是，短期内需要解决稳定的问题；中期内要解决大宗消费（楼市、车市和电子产品）

的稳定发展和转型问题；长期内中国需要构建一个扩大内需、支撑未来长期发展的制度条件。

我比较了中国对三次危机的应对，第一次是 1997 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第二次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三次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1998 年到 2002 年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应对是比较成功的，成功解决了中国经济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问题。这次成功的危机应对，让中国经济进入了从 2003 年到 2012 年年均增长 10.7% 的经济增长黄金时期。因此，我认为要讲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前景，核心问题是解决当前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最后，我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需要改革。可以按照三个步骤来优化中国的营商环境：第一步，推动放管服便利化的改革；第二步，补短板，解决金融、纳税、跨境贸易和企业准入、退出机制这些方面的矛盾。第三步，长期内，要与国际高标准的营商环境对接。

开放市场、加强贸易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

■ 维拉·松圭 / IFF 理事、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全球流动性与可持续性贷款机制 (LSF) 主席



维拉·松圭

10 月 9 日至 15 日在摩洛哥举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23 年秋季年会上，探讨了一些全球性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全球经济是有韧性的，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我有幸参与了辛格 (NK Singh) 和拉里·萨默斯 (Larry Summers) 合作撰写的独立专家小组报告，题为《世界在燃烧》(The World is on Fire)。

一、摆脱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实现贸易多样化
非洲大陆的经济现状，从根本上来看，具有惊人的韧性，但非洲大陆的贸易额并没有实现增长，在过去 10~15 年里，非洲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一直维持在 3% 左右。我尝试着去解读其中原因，以便更加了解非洲现在的处境。众所周知，贸易可以帮助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但非

洲大陆并没有通过贸易实现脱贫。

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5 年来全球首次出现了返贫，而且不仅在非洲，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返贫情况。因此，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危机时刻，在这个时刻不应该有更多的出口禁令或贸易限制政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贸易限制政策频出，正实实在在地在世界各地上演着。

我认为，尽管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面临多重挑战，但如果我们能够开放市场，推动更加顺畅的贸易流动，我们的处境就能够得到改善，并且有可能在 2024 年实现比预计的 3.3% 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方加强贸易。

如上文所述，非洲作为一个大陆，其贸易额在全球总贸易额的占比长期徘徊在 3% 左右，要将其贸易额占比提高到 3% 以上，需促进其贸易模式和地理优势多样化。

我曾撰文提出，非洲要真正实现脱贫，不仅需要将其贸易额在全球的占比从 3% 提高到 5%，而且必须实现贸易多样化。然而到

目前为止，非洲的出口贸易仍一直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和化石燃料。

二、推动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关于化石燃料。世界正在燃烧，因为人类没有管理好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人类对地球造成的污染远远多于其所做的清洁，推动能源从污染到清洁的转型势在必行。要做到这一点，从贸易入手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

非洲要真正实现脱贫，不仅需要将其贸易额在全球的占比从 3% 提高到 5%，而且必须实现贸易多样化。



我们知道，在中国等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许多新的可再生能源产品成本已经大幅降低。我们希望印度也能成为清洁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而进一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

但即使这一领域创新不断，我们仍需要更多的可再生资源。从某种程度讲，现在全球只有中国、美国和欧盟这三个主要经济体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实现了快速增长，并落实了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其中，美国推出了《通胀削减法案》，欧盟正在实施大规模补贴政策。因此，我们在向独立专家小组提交的报告中要求将多边发展融资资金增加两倍，从 1300 亿美元增加到 3900 亿美元。我们的论点是，如果能够将多边、优惠、长期融资从 1300 亿美元增加到 3900 亿美元，让各国能够真正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增长战略和经济结构基本面，那么就能够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重振全球增长。

三、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资金

更重要的是，实现上述目标单靠公共部门是

无法实现的。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优惠融资用于担保融资、混合融资或用来弥补新兴经济体风险较高的前沿市场的首期损失，那么就能够吸引私营部门进一步参与进来，并有望将 3900 亿美元的融资资金提高到 1 万亿美元。我们正在寻求 1 万亿美元的优惠融资，以便应对从现在起到 2030 年的气候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获得成本更低的长期发展融资，25 年来我们努力实现的增长将发生逆转，不仅是在非洲大陆，而且是在整个新兴市场，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我们所有人。

从巴基斯坦到莫桑比克，从德国到意大利，整个世界都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已经付出了高昂代价。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全球的共同利益，不能仅靠提高各国的债务来为其提供资金。我们必须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全球公益事业，通过多边发展机构发展新的融资机制，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其提供资金。我认为这才是未来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中的几点共性问题

■ 若阿金·莱维 / 巴西前财长、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巴西萨夫拉银行经济策略和市场关系总裁



若阿金·莱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它们的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然而，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这些共性问题。

关于这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前景，我们应该注意到，制造业只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各个国家也可以通过发展能源、食品和服务等来实现繁荣，而不是只能依靠发展制造业。所以，一些国家可以从制造业创新和较低的生产成本中获益。发展繁荣秘诀在于：激励创新、开放市场、提升生产力，有此基础任何领域都能蓬勃发展。许多非洲国家金融服务的改善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巴西农业几十年来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其在种子、技术、人才方面的积极研究和改进。此外，也显示其无人机、机械、气象软件以及改进播种和收割规划算法等创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贸易也是发展繁荣的一个关键因素，包括获得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在竞争中优先购买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能力。对于一些生产清洁能源的国家而言，获得太阳能、风能等最新技术可以增加其投资吸引力，那些难以去碳的部门也可以从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中受益。尤其是在全球企业以高效方式加速践行减碳承诺的时候，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经济实惠、高效的设备，将有助于实现减碳目标，助力发展中国家克服当前全球宏观挑战。

提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就不得不说以高利率对抗通胀是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巨大短期挑战。关于这方面问题，我想说两点：

第一，发达国家在过去 18 个月中普遍出现的财政赤字和通胀高企的情况，截至目前似乎大都

已经得到控制，现在需要的是更多耐心而非更高的利率。耐心至关重要，因为受到高利率影响的不仅有家庭、企业，还有持有低息贷款和债券的中型金融机构，它们对小企业信贷的适度限制将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从而，降低商品价格崩溃或全球金融动荡的风险，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的压力。

第二，低收入国家高负债的问题，目前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



20 世纪 80-90 年代，巴西曾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在处理外债时，成功地提供了一系列选择，以满足不同债权人的需求。对于一些债权人来说，消减贷款面值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其他债权人，特别是亚洲银行来说，只有延长期限和宽限期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本金有担保的新债券也有所帮助。尽管表面上某些选项似乎更有利于某些债权人，但它们是公平的，因为它们承认了个别债权人或债权人团体的需求。

回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金融架构经过自我调整，通过持续的沟通和对话，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的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巴西现在是包括巴黎俱乐部在内的一些机构的成员，免除了一些合作伙伴的双边债务。此外，20 国集团的多边改革也增加了资金流动。即将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将在前几任 G20 主席国的工作基础上，把减免债务作为工作重点。

总体来说，我们相信在长期关系问题上，谦逊、客观的态度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不仅适用于政府部门，也适用于私营部门。

全球经济“碎片化”：影响与应对

国际机构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34
珍妮·希普利, IFF 联合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加强多边合作，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36
易小准, IFF 副主席、WTO 原副总干事	
全球经济“碎片化”下的贸易、供应链及产业政策	38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巴西贸易部前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碎片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的前景	40
哈罗德·詹姆斯, IFF 学术委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	

国际机构的作用 及面临的挑战

■ 珍妮·希普利 / IFF联合主席、新西兰前总理



珍妮·希普利

根据我 20 多年来的经验以及对政治和全球大趋势的观察，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全球的势力范围以及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急剧变化。现在一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发展中经济体，正不断接近发达经济体。

当今动荡的世界出现了一些供应链问题、一些竞争问题以及一些冲突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国际机构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从政的早期，人们将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描述为充满活力和代表希望的国际机构，它是高度组织化的。无论大国小国都相信 WTO 是公平的，如果它们发生争议，是会被听取的。那时的人们，提

起多边主义及其带来的包容性全球经济环境，都非常兴奋。然而，现在我对 WTO 的看法是，它已经难以吸引主要捐助国提供必要资金以保持其正常运转了。有越来越多的 WTO 成员国开始质疑，如果向 WTO 提起诉讼，是否能够得到认真裁决，是否可以获得相关赔偿。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在遵守 WTO 规则方面做得不够，或者美国正在使用各种技术和话术来规避其义务。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对话，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

我想明确指出的是，我们不应指望 WTO 和其他国际机构做到人人平等，而应视其为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在参与的同时，不断完善其架构和能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其中的经济体能够满足彼此的需求，同时继续推动机构的完善。

所以地缘政治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现在我们

突然意识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是高度竞争的。现在有一些新的词汇，比如：保护主义、反竞争等，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出现了。我认为，在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时，要自付是否把国家安全用作了排外的工具？

我们需要贸易与竞争，也关注可持续发展和机会共享，它们之间有冲突和矛盾。在我看来，所谓保护主义行为，比如通常采用的补贴手段其



实是阻碍贸易竞争的一种诡计。

最后我要说的是供应链，特别是支持供应链运作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资源有义务分享，抑或由早期所有者或推动者坐享巨大的优势。我认为拥有丰富新资源的经济体有权决定如何勘探开采，就像几个世纪前的其他经济体一样。国际机构是否可以管理这一点，抑或是只需要政府来引领？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我的结论是，各国政府最终必须代表其人民和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国际机构可以帮助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应对压力。但根据我的观察，国际机构本身并不发挥领导作用，只是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国际机构的参与者可以权衡机会和风险，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

我仍然坚定地支持全球经济开放，希望摒弃脱钩的想法和行为。另外，私营部门渴望有一个自信、安全、积极的环境，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可以从容地部署人力和财力资源。因此，我认为，不能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幌

子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所有国际机构都要努力克服这一障碍，以便在未来 50 年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恢复过去 50 年的经济发展势头。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停滞期，部分与地缘冲突相关，但不必夸大这一点。我认为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新趋势、新问题，我希望能了解新趋势、迅速应对新问题，让可持续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国际机构也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现实问题。

加强多边合作， 重塑全球治理新格局

■ 易小准 / IFF 副主席、WTO 原副总干事



易小准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世界经济遇到去全球化的逆流。国际经贸关系、规则日益碎片化，开放的多边主义陷入困境，全球的经济治理面临着多重挑战，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将经贸问题地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他们推出了很多针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保护主义政策。比如，用行政手段来强推科技产业链“脱钩断链”、推行“产业回流”和制造业的“友岸外包”，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单边的经济制裁正在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出台，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实力为基础的丛林法则正在回归，对多边贸易规则构成严重威胁，就连一度被世人赞

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也被无限期地瘫痪了。显然，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贸治理秩序正在崩塌。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负责全球经济治理的布雷顿森林三大机构严重分裂，作为领导应对经济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二十国集团 (G20)，现在也已无法正常运转。在没有有效的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的情况下，一旦爆发新的全球性疫情，或者发生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各国势必会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以邻为壑、高筑壁垒，这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上述全球性的重重危机，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我认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需要理性地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各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大国应当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主动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通过加强在 G20 和包括 WTO 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多边合作，重塑共治、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打造稳定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早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同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

发展压力。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让我们思考，各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中国总理李强 2023 年在德国与西门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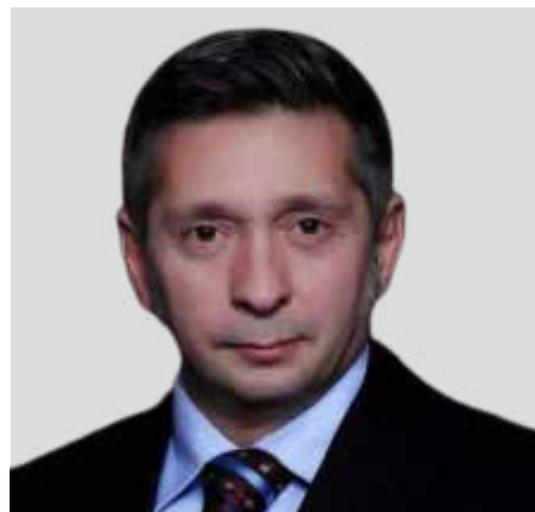
众、奔驰、宝马等德国企业负责人座谈时说，“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完全同意李强总理的这个看法。至少对于中国而言，不开放就不会有发展，落后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所以我们应该在保持开放的状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放弃对外开放。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泛安全化，不是安全的问题，非要把它说是国家安全。比如经济安全，以前 WTO 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跟经济有关系，如果都和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话，WTO 的规则就成了一张废纸。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世界几个主要大国遵守 WTO 规则，在 WTO 的规则里对国家安全有清晰的定义，比如进入战争状态或者是有明显的军事上的冲突。如果不是紧急的情况就动用贸易限制，说“这是涉及国家安全，大家都不要管”。如果这样，WTO 的规则就彻

底被抛弃了，全球就会进入丛林法则，比较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算。

全球经济“碎片化”下的贸易、供应链及产业政策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巴西贸易部前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当今世界处于多重危机之中，有人认为这是暂时性的。我认为我们要应对的是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我的研究领域是经济，所以我主要从这个角度谈我的看法。

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一二十年前，现在发展中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超过 50%，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已经超过 50%。这场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更是全球性危机。气候变化、减贫、提高就业率和生产

率以及应对犯罪和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在积极寻找犯罪率上升和不安全感增加的解决之道时，不能只试图寻找自己的答案，而是要认识

到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另外例如健康和教育、国际移民、住房、卫生等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如果不理解上述问题的性质就无法讨论贸易和供应链以及理解产业政策。

过去 20 年有很多关于产业政策重生的讨论，而我认为产业政策从未消亡。美国和欧盟都有非常强大的产业政策，虽然可能不是冠以产业政策之名。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明白科技和贸易是产业政策的核心支柱，虽然不叫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一直长期存在。可以说，世界上其实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停止过产业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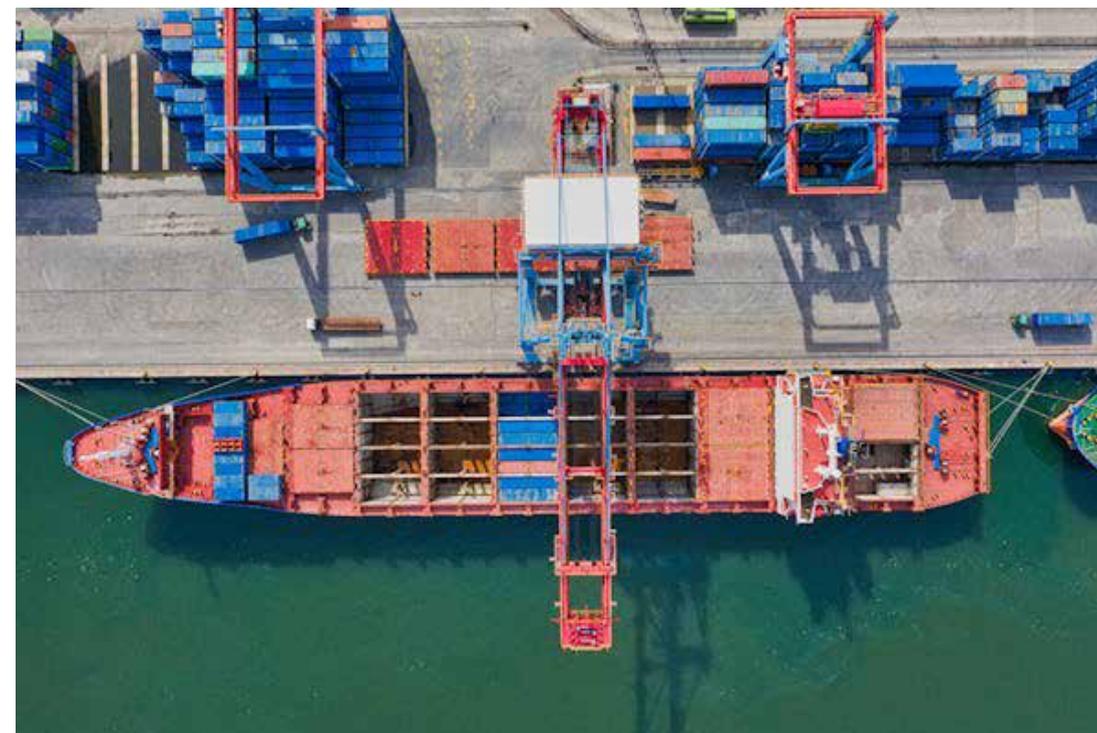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关税，有的国家说自己降低了关税，但实际上关税和技术壁垒在长期增加。有的国家说自己没有倾销，但现实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金融领域也存在很多倾销的情况。

我们需要直面当前的挑战。我们正在经历的是长期政治、经济碎片化，这种情况不仅是

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实际上脱钩或者说一个国家尝试自己解决问题的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过去五年里多次指出的，我们距离实现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中的任何一

项都相差甚远。《巴黎协定》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没有兑现；贫困、饥饿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所以，我认为多边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有的国家说自己降低了关税，但实际上关税和技术壁垒在长期增加。有的国家说自己没有倾销，但现实是不仅在商业领域，在金融领域也存在很多倾销的情况。



我们需要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全球治理。然而现实是，面对世界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却没变。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国家，我也不想责怪美国，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阻碍本应是多边的谈判。

最后我要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进行坦诚的对话非常重要，因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发展权利。非洲大陆在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工业化等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非洲不应仅作为原材料的供应方，也并非对自己未来没有判断。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在讨论能力建设或制度建设时指出，非洲国家没有实现发展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准备好或腐败太严重等等。我们应停止谈论非洲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找到全球性解决方案，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可以让他看看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遭受的泥石流、洪水

和地震灾难。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需要在全局层面解决。我认为国际金融论坛 (IFF) 非常乐意推动这类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碎片化”背景下 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的前景

■ 哈罗德·詹姆斯 / IFF学术委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



哈罗德·詹姆斯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期，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虽然从2022年2月俄乌冲突开始局势就已经非常严峻了。全球金融市场以及美国财政部十年期国债的变动都反映了这一点，显示了基本面的脆弱性。

一、关于碎片化议题

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6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出，例如关税的增加，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举措，但是在特朗普时期遗留下了太多待解决的高关税问题。

二、关于去全球化的议题

我们注意到全球贸易额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

易额依然在快速增加，这样的事实表明现实中去全球化并没有那么严重。自2017年以来，无论是在特朗普还是拜登执政时期的关税政策下，中美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尽管部分类别下有一些绝对值的下降。相关文章和研究指出，事实是美国与多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都在增加，也在进口更多的货物，例如美国和越南、墨西哥的贸易额在增加，与此同时墨西哥和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额也在增加，所以现有的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现实中存在着一些中介国家，使得哪怕是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去全球化。供应链如此之复杂，除非我们将其细分再细分，否则无法了解其复杂程度。

疫情之后全球陷入了各种匮乏，像食品、医疗设备、医疗物资、半导体的生产需要各种不同的原材料，它们可能来自于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因此我们会发现全球供应链中出现了非常多的卡

现实中存在着一些中介国家，使得哪怕是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去全球化。

点，这显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供应链中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卡点，而金融同样也是卡点之一，各国利用这些卡点并把其武器化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例如：俄罗斯在2022年之后，迅速将全球供应链石油和天然气卡点武器化。遗憾的是，不只一个国家在这样做，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操作。面对这种局势，亟需对这种武器化举措进行限制，并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切实有效地运作。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崩溃了，尽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功能也在被武器化，但我仍然认为它们可以

发挥有效作用。

三、关于去美元化议题

美元可替代性的选择是什么？欧元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替代选择，尤其是在更加紧密的财政一体化背景下。而人民币如果无法做到完全可自由兑换，也无法替代美元。那么是否会有其他的替代货币呢？事实上，尽管很多国家具备有效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但仍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例如阿根廷正经历的总统换届或土耳其极高的通胀。如果这些国家想找非美元的替代货币，不一定会选择人民币或欧元，部分私有货币同样是一个选项。在我看来，这可能会导致私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在考虑去美元化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更加多元化的货币体系，除了现有的大国货币，以及加元、澳元这些国家的货币之外，数字货币同样不容忽视。

理解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把货币视作一种语言，我们需要一些标准化的语言进行翻译，美元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深深地渗

入了市场，就像英语被广泛用作工作语言一样。现在由于主要技术的突破，无论讲话者使用哪种语言，翻译设备都可以让听众听到自己的本国语言，科技进步提高了沟通交流的便利程度。英语有可替代语言和美元有可替代的货币一样，当存在地缘政治和战略性不稳定情况时，替代选择就需要纳入考虑，通过新技术来实现多种货币的彼此可兑换。而这也可能会帮助我们回归稳定，满足新兴经济体的筹资需求。如果无法实现，或许就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地加强多边主义、数字货币、私有货币，让全球的货币形成一种合理的竞争。



法规和激励机制 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 周小川 / IFF联合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

我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有高度紧迫感。最近两年，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碳减排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或者说积极性有所减弱。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上用的词是 backlash，原文标题是：How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anti-climate backlash?（如何应对全球反气候浪潮？）我觉得我们应正视这个问题，这将有有利于我们取得共识，进而采取正确行动。

到底有没有 backlash？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天然气供应紧张。与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相比，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度被相对降低了。最近又爆发了巴以冲突，也对能源及其他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能否保持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确实是令人担忧的。

第二，目前国际上成立了很多自愿性的气候联盟，有几千家企业作出了碳减排承诺，特别是在《巴黎协定》签署和 COP26 召开之后。但是最近两年，作出碳减排承诺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在几千家的水平上，基本没再增长，甚至还有一些大型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表示，之前所做的承诺难以兑现，表示要退出联盟，这是值得警惕的。当然全球也非常关注“漂绿”行为，有一些企业对承诺落实得不错，但是仍有不少“漂绿”的行为。

第三，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觉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实际上，有些人对气候变化深信不疑，有些人则对其不置可否或知之不多。即便是那些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人，也分三种情况：一部分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自己甘愿承担成本，付出代价；一部分人是中立的，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应该的，但对应该由谁来承担成本，不置可否；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但是不能让他自己付出代价。这些公众态度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到底谁应该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代价？很多人认为应该由富国、富人承担代价，同时应该由他们出钱帮助穷国、穷人实现减碳。当然，这种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尤其是如果牵扯到历史上积累的人均碳排放总量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公众的看法会对选票、对政治家产生影响，因此政治家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的态度也不一样，比如对电动汽车的评价、

气候变化应对与可持续发展

法规和激励机制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周小川, IFF 联合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43
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与落实及中国的实践与挑战 吕学都,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气候变化专家	46
加大碳减排投入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戴青丽, IFF 副理事长、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48
私营部门和全球碳市场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 埃里克·索尔海姆, IFF 副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50
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52



对于碳税的评价等等。

2023 年气候变化导致了全球爆发多起极端天气事件，例如高温、水灾等，按理说应该大幅增加大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但是总体来讲响应并不充分，可能与当前全球热点事件频发有关。与此同时，各国原本计划采取的限制煤炭、煤电以及限制油气开发等措施，与现在的实际行动也有明显的差距。无论这种情况是否叫“倒退”或者叫“backlash”，我们都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在我参加的一些气候变化研究和讨论中，尤其在《巴黎协定》和 COP26 之后，很多人以为全球已经进入了向零碳赛跑 (race to net zero) 的进程。目前来讲，大概有 25% ~ 30% 的全球大企业加入了 race to net zero。因此会给人家一种印象，现在是 25% ~ 30%，再过几年可能是 50%，再过几年可能是 75%，再过几年是 90%，最后全球 100% 的企业都加入了向零碳赛跑的进程。既然减碳趋势这么明显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就不一定非要采取像碳税这种需要得罪公众

的措施了。

但实际情况是，加入向零碳赛跑进程的企业数量好像停滞了，并没有如大家想象那样在逐年明显扩大，反而还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声音。因此，在鼓励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加强认识和自觉采取行动的基础之上，还要有更明确的规则和激励机制。不管你有没有觉悟，你的认识如何，你都必须受法规的约束。不管企业想不想减碳，都要受到激励机制——主要是价格型激励机制的约束，必须减碳。这是过去两三年，我们针对“主要依靠什么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得出的结论。

我个人其实主要关心中国气候变化和减碳的发展，我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也说明法规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做得好的方面，也有一些做得不够的方面。好的方面应该说有四大强项：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和储能，这四个方面在全球来讲都算是发展比较领先的。我个人觉得，价格机制，包括成本控制和补贴以及其他有价格含量的结构性政策都帮了不少忙。中国曾经对风电、光电、电动汽车提供财务支持和

结构性政策支持，包括对风电、光电优先上网，加强基础设施使其能容纳更多风电、光电，调度储能设备的积极性空间增大，从而激励了风电、光电、电动汽车、储能的快速发展。

当价格激励机制不充分的时候，号召往往会流于形式。比如在中国光伏发展的早期，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价格激励机制（包括补贴）不能有效激发在国内大力铺设光伏电源的积极性，导致那个阶段中国生产的光伏电池基本上都出口了，主要是出口到欧美。直到中国有效的激励机制出现后，当然也包括制造成本的大幅下降，激发了大量民间机构的积极性，开始大力铺设建设光伏电源基地，最终使中国光伏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风电产业类似，储能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过去强调要发展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特别是抽水蓄能。过去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目标连一半都实现不了，因为企业和私人机构入不敷出，所以难以发展。后来理顺了价格机制，同时还设计了容量变价，即容量可以直接兑换成收入，使得最近两三年抽水蓄能电站大幅上升，大概每年新批项目有 200 多个。因此，纵观中国这几个强项的发展进程，从正面和反面都说明了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中国也还有做得不够、甚至很不够的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第一，中国 GDP 的能耗强度仍然很高。第二，公众响应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府希望尽量不影响老百姓生活，所以中国居民的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基本没什么波动，这与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飙升的情况很不一样。这样虽然赢得了公众的欢迎，但是也可能导致公众响应不足。当然这也是因为在中国的耗电结构中，工业用电占比较高，而居民用电占比较低（约为 15% ~ 20%）。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工业生产的很多产品又间接地转换成了消费品、住房等等。

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积极地参加全球关于 regulation 的讨论，在制定规则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中国应该加大运用激励机制的力度（虽然现在已经运用了一些激励机制，但是还有差距）。运用好激励机制，首先要理解和发展好碳市场。目前中国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全国碳市场，规模很大，但是交易量较低，起到的作用也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免费配额分配得太多，甚至免费配额有时候还有富余，所以对于碳价格的形成和起到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有限。

此外，中国的碳市场比较分隔。中国有规模比较大的广州碳市场，还有天津碳市场，北京的绿交所也主要做资源限额，还有上海碳市场，这些区域性碳市场的风格和价格存在明显差异。未来我们还需要考虑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以及欧洲碳市场的相互关系。

再有一点，中国碳市场发展不够，还与居民在用电、用气、用油（主要是指汽车）方面的保护措施有关，国家在这方面顾虑比较多。而且，中国目前对使用者减碳意识的提高和成本的控制还不够。

中国是人口大国，14 亿人都要住房子，住的房子保温性能是否好，空调取暖会排放多少碳，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中国房屋的保温结构差距相当大，应该加大相关投资，大幅度提高房屋保温性能。在这方面，全球投资的资金缺口也很大。

法规和激励机制的发展需要全球协调，我个人觉得中美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中美是两个碳排放的大国，双方应该减少不信任，增强相互协调。

另外还有碳边界调节机制 (CBAM) 要认真地去了解、分析，该机制未来应该可以对全球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总之，我认为在现阶段，强调法规和激励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有思想认识和觉悟方面的提高，更要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样才能切实落实气候变化应对行动，从而完成联合国《巴黎协定》规定的气候目标。

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与落实 及中国的实践与挑战

■ 吕学都 /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气候变化专家



吕学都

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谈我自己对规则制定问题的认识。

首先，规则与激励息息相关，规则本身既能产生激励，也会带来惩罚，所以规则确实特别重要。回顾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则的历史，从 1991 年开始谈判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至今，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条最重大的全球的规则，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后来又有《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和《巴黎协定》。有了联合国的规则后，各国又制定国内的规则来履行国际义务。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指出，全球已经进入了“沸腾”时期，也就是说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规则，全球可能早就进入“沸腾”时期了。所以，制定规则特别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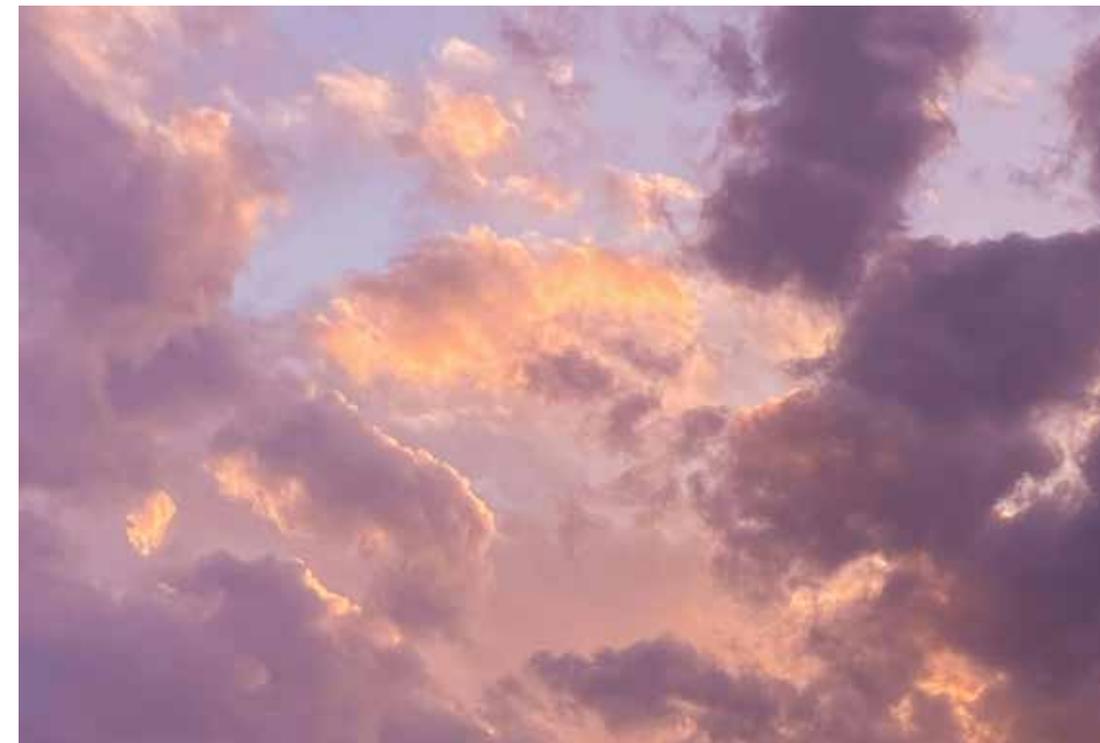
第二，有了规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履行规则。世界各国在履行气候变化规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绩，也提升我们的信心。当然也有很多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包括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等，在这方面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都不尽如人意。发达国家国内的执行规则在这方面确实也不够充分。总之，在有规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规则的落实，无论是联合国的规则还是各国国内规则落实，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三，在制定规则的时候要考虑近期、远期以及社会影响。制定规则兼顾不同国家的国情，才能保证落地实施。如果制定出来的规则不符合国情或不符合全球形势，执行是非常困难的。零碳目标的实现有其技术和经济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我认为有关国家、地区在制定相关规则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规则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我参加过很多关于碳边界调节机制 (CBAM) 的讨论，我认为 CBAM 的初衷是积极的，但它的影响未必那么积极。CBAM 是一种国内的法律，但它的影响力却是全球性的。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法规，需要在全局层面进行磋商，否则可能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很难执行。如果各国采用不同方法，也不利于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且 CBAM 的一些负面影响也需充分考虑。

第四，我想简单说一说中国在气候应对方面的一些做法。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宣布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全国上下积极制定相关规则、采取具体措施。中央各部委接连推出行业政策、综合政策，各地政府的行动计划也相继出台。



2023 年 10 月 19 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这是一个新的市场化竞争法规。还有一些激励政策也在出台，比如地方政府制定的碳普惠政策，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的激励政策。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激励政策。

从覆盖面和实施力度来讲，目前中国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覆盖了所有领域、所有地区，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中国有很多相关政策和规则还很不完善，需要循序渐进修订完善。最近我在撰写的一些文章中谈到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碳交易标的，要么是碳的配额要么是碳的信用，它应该有资产属性，但是中国的法律法规里面没有任何条款来

界定它有这样的资产属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气候变化的相关规则与激励机制，应该在更高层面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更具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样更有利于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目前有大量的标准都在考虑或者研究当中，这些标准对于如何引领整个社

会去发展绿色技术至关重要，尤其是涉及绿色低碳的标准。这些标准和规则都特别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制定出来以后怎么去落实。

气候变化的相关规则与激励机制，应该在更高层面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更具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样更有利于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加大碳减排投入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 戴青丽 / IFF 副理事长、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



戴青丽

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关于美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想法。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并没有成为全球领导者。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主要是由商界推动的。美国的投资银行创造了新的融资模式，并利用资产负债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美国的企业如特斯拉、霍尼韦尔等也在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随着拜登政府上任，特别是《通胀削减法案》(IRA) 出台后，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老实说，《通胀削减法案》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大，它更多是与碳减排有关。

众所周知，《通胀削减法案》是美国有史以来通过的最大单项气候立法。该法案涉及从全球能源、交通到制造业、住房等广泛的经济领域。它试图推动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面向企业、消费者和市政当局，采取赠款、贷款、回扣和其他

一系列激励措施。

该法案最初通过时，人们普遍认为气候方面的总支出将达到约 4 亿美元。然而，最新的估算显示，《通胀削减法案》十年总支出可能接近 10000 亿美元，远超当初的预估。这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税收激励措施的上限，而且该法案的通过率和投资额都非常高。

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通胀削减法案》将助力美国大幅度减少碳排放，预计到 2030 年，将比 2005 年的碳排放量减少 40%。

现在，美国政府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胡萝卜”而不是“大棒”上。除了对甲烷排放征税这一特别例外，《通胀削减法案》都是补贴而不是征税。

首先，美国政府认为碳税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在美国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事实上，美国人并不喜欢碳税，无论其结构如何。经合组织 (OECD) 的一些研究表明，只有 34% 的美国人表示支持 45 美元 / 每吨的碳税。

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将碳税与所有家庭的实际现金转移挂钩，支持率会略有上升，达到 38%。如果以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征收碳税，支持率则降至 29%。尽管碳税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的工具，但它并不受美国公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环保表现优秀的华盛顿州，碳税提案也总是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碳税如此不受欢迎？因为人们担心它会提高能源价格。这也反映了“搭便车”的观点。因为碳税是地方性的，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华盛顿州征收碳税，意味着本州居民支付了税款，而其他州甚至其他国家的居民却从中受益。

以上解释了人们对碳税反感的原因，那么美

国政府又为什么对碳税采取激励措施呢？拜登政府曾打赌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好办法就是改进绿色技术，而最快的方法就是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投资。

《通胀削减法案》的设计者，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瑞安迪斯 (Ryan Dees) 一直认为，战略性公共投资是实现经济去碳化的最佳和最快途径。他们认为，税收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将迅速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这样，不但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会下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激励，从而实现去碳化。从根本上说，人们希望这将产生全球性的更大影响。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认为美国有一些事情值得关注。首先是 2024 年的总统大选，新总统有可能会试图废除《通胀削减法案》，收紧税收抵免的限制，暂缓发放部分贷款或赠款，或改变财政部和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正在制定的各种机构规则。

其次是关于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新规定。2023

年早些时候，美国环保署公布了一些雄心勃勃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会重塑美国的交通和电力行业。其中包括削减国家燃气发电厂排放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已经受到挑战。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被要求阻止拜登的“好邻居”污染规则，以减少有害烟雾和空气污染。它跨越州界向下飘散。此外，我们还必须关注美国及其盟国如何协调各种机会，使《通胀削减法案》在全球的利益最大化。

鉴于《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后，美国和欧洲之间已经出现的紧张关系，将需要一些谨慎的评论。我们听到许多金融业人士说，《通胀削减法案》将成为该行业气候繁荣或工业革命的催化剂。补贴将产生乘数效应、创新和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再加上中国为其产业提供的财政激励措施。我们可以预见，欧洲用于促进气候创新的资金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显著改善。现在，关键是要确保这些资金能够惠及全球南部真正需要的地区。



私营部门和全球碳市场 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

■ 埃里克·索尔海姆 / IFF 副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埃里克·索尔海姆

现在一提到气候谈判很多人就感到绝望，因为气候谈判鲜有成果。这是因为谈判的关注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关注政治经济，而不是外交。坦率来说，外交带来的成果非常小，聚焦国家之间的外交博弈，常常导致参与其中的关键人员脱离经济和政治现实。例如，两年前（2021 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围绕碳“减排”还是碳“净零排放”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对现实毫无意义，只是一些外交家和政客的游戏。

就在同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中国为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采取的又一项重大决策，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例如，决策宣布后，越南和印尼开始向中国寻求太阳能代替煤炭发电方面的支持。

据统计，2022 年发达国家共做出了 200 亿美

元的气候融资承诺，这显然只是杯水车薪。同一年，拜登总统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向气候和新能源领域提供 4000 亿美元资金支持。相比气候谈判只承诺 200 亿美元，美国国内立法提供了近 4000 亿美元，这无疑是某种保护主义，但也确实可以对美国绿色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也出台了类似的大规模计划。这些都比气候谈判上所做的承诺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应该把关注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政策上，而不是外交上。

我在担任斯里兰卡总统顾问期间，曾提出过一些建议。关于绿色转型，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应该重点关注私营部门，因为真正能够帮助斯里兰卡的是中国、印度、日本、欧洲以及美国的私营投资。可能需要全球金融机构承担一些风险，可能需要一些风险缓释工具，但是最终还是需要像隆基这样的绿色能源企业提供清洁能源，它们才是大量资金和转型动力的来源。所以，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私营部门、私人投资、大型银行、保险公司和项目开发者，一些风险可能由国际金融机构承担，两者兼顾。这个建议也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关注重点应放在新兴的全球碳市场上，现在还没有碳市场监管和全球评估，但是世界上所有大型公司在未来都必须购买碳额度。例如微软承诺到 2030 年实现碳中和，并且弥补微软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碳排放，他们可以在价值链上做很多的事情，例如可以将计算机放在海底，实现自然降温，也可以为所有数据中心提供太阳能。但是，所有这一切最终还是要由购买碳额度来实现的，而且全球每家科技公司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公司都是如此。有人说航空业可以



快速进入电气化、可以使用氢能，但这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它们也需要购买碳配额。这些都给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的确，目前碳市场还缺乏监管，也并不完美，但是会出现重大机会。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主要有两大资金来源——私营部门和碳市场，而不是国际谈判或多边开发银行。

2023 年 10 月刚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150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了印度大都参与了“一带一路”。中国将在绿色、太阳能、氢能、高速铁路、电动汽车等领域进行投资，电气化绿色低碳转型将是中国的主要方向。

“一带一路”是中国主要对外投资方式，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批评，先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普遍都对“一带一路”提供的支持感到高兴。当然，西方国家也提供了一些合作项目和机遇。我认为西方提供的项目应该和“一带一路”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在一些领域，西方领先中国，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国领先西方，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批评、相互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合作才能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气候谈判、多边开发银行和全球金融系统，应该是私营部门、私人投资和碳市场，它们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

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气候谈判、多边开发银行和全球金融系统，应该是私营部门、私人投资和碳市场，它们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动力。

进一步推动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 王信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把可持续环境信息披露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以说是绿色金融的五大支柱之一。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方面，2021 年 7 月，在充分参考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鼓励金融机构定量披露自身运营和投融资活动的碳排放量和碳减排量，并配套编制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为进一步明确碳排放量和碳减排量核算的技术要点，目前正在修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另外，《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也正在参考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最新标准组织修订。

第二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非常重视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约束机制。为此，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的支持工具，要求金融机构在获得人民

银行资金支持时，需披露相应的碳减排信息，并经第三方认证，这样的举措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发展。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将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纳入评价体系中，作为一个定性评价的指标。如果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表现良好，将对其评价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鼓励其更加积极地开展环境相关工作。

第三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该试验区对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要求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非常注重参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在国内，虽然该项工作是由财政部牵头，但人民银行也积极参与讨论并提供意见。在 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联席主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过去几年，我们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2021 年，《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提出建立全球统一的可持续披露标准，作为 19 项具体行动之一；2022 年，《G20 转型金融框架》将披露要求作为转型金融“五大支柱”之一，要求披露完整的转型方法、碳排放信息和具体的治理安排；2023 年，把改进自然相关数据和报告、克服气候投资中的数据相关障碍作为重点推进事项，将可持续信息披露列为“技术援助行动计划（TAAP）”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鼓励两国金融机构参照 TNFD（自

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框架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试点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在披露框架和形式、研究成果、标准制定、探索披露棕色资产、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接轨 TCFD 框架、碳中和路径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当然，目前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还面临不少的挑战，包括金融基础数据获取难、质量不高，且信息披露本身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仍有待提升，披露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其他相关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进展，结合实际、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进。为此，我们需要强化绿色金融评价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带头作用，推动大型银行和系统重要性银行走在前列，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同时，

要鼓励产业链上的大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进一步披露环境信息。另外，我们也要加强对 ISSB 和 TNFD 等国际最新披露标准的研究，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披露框架。



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思路与前瞻

■ 魏伯昂 / IFF理事、瑞银集团前董事长、德国中央银行前行长



魏伯昂

现的调整幅度。即便如此，现在对风险的平衡更加合理了，因为通胀在持续下行，不断接近央行的目标，虽然目前仍然有些偏高。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但经济降温是抑制通胀所必需的。在我看来，差不多到今年（2023年）12月份，当各国央行开始进行2024年经济预测时，利率有可能面临再次小幅调整。中央银行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立2%通胀目标的可信度。

另外就是市场会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如前文所述，欧洲央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同步收紧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有所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缩减将使我们15年来对股市的结构性流动性支持化为乌有。在全球流动性的推动下，唯一合理的投资就是股票投资。对市场的这种影响现在变得更加不利。我们将看到流动性变得困难和可贵，除非中央银行决定重新介入，通过注入短期流动性来消除结构上的一些缩减。但是，与长期可靠的流动性支持相比，这种对市场的支持作用确实要小得多。

另外，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投资组合也许会转向固定收益资产，并加速从较短期的固定收益资产转向较长的固定收益资产，导致市场上较短期限的资产继续面临抛售压力。

在零利率时期，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渠道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大部分政策是全球同步的。投资组合平衡渠道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人们大量投资于股票，而固定收益资产没有收益，因此没有吸引力。主要的同步渠道实际上是财富渠道，许多股票市场的繁荣都是通过财富渠道传导到货币政策的。

首先，我认为了解央行目前的立场非常重要。当我们初步从疫情中走出来时，首要任务是让经济热起来，当然实际上也让通胀热了起来。而现在，我们要让通胀降温，经济也将随之降温，而经济降温不可能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现。因此，我们将看到的是，央行允许经济降温超过一个中性点，而这一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在市场上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市场感觉到的是还有操控空间，预计最早从2024年开始，央行将允许利率下调。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全球货币政策。全球经历了二战后历史上最快速、最强劲的同步加息周期。一般来讲，货币政策都会比较滞后，因此相关措施也会滞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调整经济以适应加息。我认为市场严重低估了可能出

当我们初步从疫情中走出来时，首要任务是让经济热起来，当然实际上也让通胀热了起来。而现在，我们要让通胀降温，经济也将随之降温，而经济降温不可能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实现。

金融及资本市场：稳定与风险

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的思路与前瞻	55
魏伯昂，IFF 理事、瑞银集团前董事长、德国中央银行前行长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和债券市场情况分析	57
布莱恩·佩斯科，IFF 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首席执行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需要关注合法性、可信性与相关性	59
林建海，IFF 常务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秘书长	

现在，所有其他渠道都将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央行和其他机构都在谈论当前货币政策的传导要比我们最近几周看到的任何情况都要有力得多。最后，我想指出几点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银行的交易下滑，仅为账面价格的一小部分，银行的盈利能力很高，但这并没有真正帮助它们提高估值，因为银行当前业绩中的净利息收入所提供的支持，实际上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将更高的货币政策利率以存款利率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

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最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施加结构性压力，促使银行采取更多措施。此外，客户也会以转移资金的方式对银行施加压力。当大量存款外流时，特别是当银行突然感觉到有交易对手风险时，基本上此时存款回报非常低。这使得银行更容易受到存款外流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显然是财富管理挤兑。它是影响银行结构性变化的根本，而不是零售存款的挤兑，美国的几家破产银行和瑞信银行就是如此。瑞信银行拥有相当稳定的资金基础，在 2022 年股票市场表现疲软之后，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钱都存在账户上，等待投资，这些人对任何风险都非常敏感。

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它们可能是最接近单一财富运营的两家美国银行，就像瑞信在瑞士一样。因此，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财富诱导型财富管理，诱导规模更大、对价格更敏感的客户和对风险更敏感的客户。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广泛的零售客户的流失。但在当今时代，零售客户的流失是无法排除的。

第二，我们需要看看那些在上一次危机中，没有像上述银行受到冲击，并且蓬勃发展的市场。比如房地产市场，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因为美国的抵押贷款融资现在是非常长期的。但商业地产、信贷市场，尤其是杠杆贷款，存在低等级收益率但风险较高的领域。从区域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前，德国、荷兰、韩国、澳大利亚、瑞典、

新西兰等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繁荣。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房地产繁荣或房地产市场的大规模调整。

我们通常遵循的规则是，当出现了危机，就按照之前的经验来应对，虽然也许问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事物。上一次出现问题的地方必须在重组中吸取教训，没出问题的地方，这次也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商业房地产就是其中一个领域。主权债务，尤其是新兴市场债务，迄今为止表现尤为强劲，因为它们甚至提前应对了主要央行的利率调整。我认为未来三年的经济发展将充满坎坷，相应的，也将会有很多调整政策措施出台。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和债券市场情况分析

■ 布莱恩·佩斯科 / IFF理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首席执行官



布莱恩·佩斯科

讲市场情况之前，我想先用几句话介绍一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ICMA 是债券和回购市场以及短期市场的国际领先行业协会，总部在苏黎世，伦敦、布鲁塞尔、巴黎都设有办公室，香港是 ICMA 亚洲代表的办公室。ICMA 是非营利机构，有 66 个司法辖区的 650 个会员，所以 ICMA 是一个全球性的协会。ICMA 有 25% 的协会成员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于亚洲。ICMA 的会员来自于金融行业的各领域，包括发行人、承销商、交易商和经纪人、各类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官方机构、中央银行、律师事务所，以及交易所和基础设施提供商，如中央清算交易方和证券托管机构。

ICMA 关注一级、二级市场和回购市场，工作重点是可持续金融和可持续债券市场，以及如何让资本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推动绿色转型。ICMA 也非常关注通过数字技术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使资本市场能够效益更高、效果更好。

为促进更有效率、更良好的债券市场，ICMA 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即确立标准和树立最佳实践。ICMA 参与编写最核心的国际文档标准，也参与编写二级市场债券和贸易争议框架，以及绿色债券和可持续金融原则等核心文档，这对于国际资本市场框架的设置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是比较技术性的，ICMA 为回购市场提供法律文档，支持全球回购交易。回购是基于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短期、安全的借贷。ICMA 积极推动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努力确保监管均衡且适合高效的市場，又要确保市场不会被法律法规太束缚手脚。

除了上述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的作用、背景及其固收，也不能忽略债券市场以及回购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它们是关键且灵活的，既是国际融资的基石，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全球债券市场的规模约为 160 万亿美元，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券市场，中国排名第二，规模约为 22 万亿美元。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可以看作一个单一市场，它的债券市场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融资来讲也至关重要。现在全球债务高企，过去 10~15 年也是如此，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因为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出台了更多支持本国经济的举措，上马了很多融资项目，导致疫情后各国债务普遍处于高企的状态，可以说现在全球没有一个市场的债务处于较低的水平。

所以现在无论是市场规则、宏观经济还是通胀、地缘政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市场结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就会对透明度以及传统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和冲击。现实是，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对市场造成了更多冲击，在大

家不知不觉中利率高涨已经在全世界非常普遍。虽然各国央行努力将利率维持稳定，但这种维持总有一天会结束。目前对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冲击仍然持续而广泛，美国政府甚至面临紧张停摆的风险。美国的债券市场也受到严重冲击，当然许多事件都和金融体系密切相关，比如瑞信银行危机、美国几家银行的倒闭，这些都会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市场的流动性也会产生很大波动。

当然，现在全球市场也并非一片灰暗，还是有亮点的。比如，市场的韧性、债券市场的回归，以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逐步恢复，尤其是一级市场现在已基本恢复正常运转了。

下面我谈一下市场结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全球市场利率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非银行机构参与资本市场有目共睹。传统上，银行在资本市场起着主导作用，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金和融资转移到了非金融机构，并导致市场透明度降低。这不但使投资者看待资本市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增加了金融监管者的监管难度。因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与传统的对银行的监管是不一样的，而监管者尚缺乏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经验。非金融机构更多地使用了创新方式进行债券交易，在带来了更多流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2023 年，大量资金流入债券基金，所以人们不仅需要关注固定收益市场如何获得收益。与此同时，央行开始实行量化紧缩政策，从系统中抽走流动性。在当今市场结构变化的情况之下，将债券卖回市场，这显然会造成额外的抛售压力和高收益情况。当然，金融主管机构和监管机构对债券监管的加强，也使人们对于投资这一领域更

加审慎。我认为一些关键的摇摆点可能会真正影响市场基调，并造成市场波动。当然，通胀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黏性，也就是说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在央行加息轮结束时，通胀很可能会再次高企，导致再一次加息，从而进入了循环。

我认为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ESG 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基建、新科技、新能源等的成本非常高，而地缘政治、友岸外包从经济角度而言成本也不低，这些都会对通胀造成压力。

最后，讲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政府采取的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如前文所述，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到现在为止，它的流动性很强，市场很大，而且非常国内化。国外投资者普遍很谨慎，因为它们既要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要关注信用方面，尤其现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利率的差异也使外国投资者犹豫不决。因为中国目前的利率远低于美国和欧盟，所以国际资本往中国资本市场流动的意愿较低。过去 5~10 年，中国改革开放、解放市场的举措深受国际投资者欢迎，但无论是债券还是互换方面，走的步伐还是不够快。我认为可以把香港作为一个桥梁，连接中国内陆和国际市场。另外，建议简化程序性繁文缛节以吸引国际投资者。

传统上，银行在资本市场起着主导作用，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金和融资转移到了非金融机构，并导致市场透明度降低。这不但使投资者看待资本市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增加了金融监管者的监管难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需要关注合法性、可信性与相关性

林建海 / IFF 常务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秘书长



林建海

当我们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改革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时，三个关键词迅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合法性、可信性、相关性。这三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们努力工作的基础。

首先是合法性。它意味着 IMF 必须有一个治理结构，而且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使其合法有效。治理结构应该足够灵活，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而不是僵化不变的。这些都是使 IMF 合法化的重要元素。只有这样，IMF 才能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起到一个机构的作用，在决策时能够在各个方面正常运行。

其次是可信性。我认为这个词包含了几个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良好的治理结构。这一点合法

性是一样的，治理结构要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局势。此外，必须要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当成员国基于内部收支平衡需求，需要外部融资支持，以促进提升储备时，IMF 要能够有足够的金融资源给予支持。同时，IMF 需要拥有强大、有能力的工作人员，以实现其使命和责任。

此外，IMF 的政策和方法在产能开发、建设及发展等方面应该是平衡的。换句话说，在贷款监管、技术能力、建设支持方面，都必须以平等的方式向所有的成员国提供。只有满足上述所有条件，IMF 才是可信的。

最后是相关性。相关性也一样需要一个良好的治理架构，而且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支持，同时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够灵活调整。必须要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应对和解决财务和金融危机。同时，还要拥有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必要的工作。所有这些都应该是灵活的，能够随着时间而调整。

当我们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改革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时，三个关键词迅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合法性、可信性、相关性。

以上三个关键词之间有很强的共性。具体有哪些共同的要素呢？可以简单总结为两个词，也是 IMF 前总干事拉加德经常谈到的——“心”和“钱包”。也就是说，如果 IMF 想取得成功，需要“心”，也需要“钱包”。“钱包”顾名思义就是要有足够的金融资源，以支持各个成员国。“心”又是指什么呢？“心”的意思太多了，它意味着正确的治理结构、洽谈方法或恰当的思维方式，需要有合适的具备适宜技能组合的员工来应对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必须是灵活可变的，这才是“心”

之要义。有“心”和“钱包”的 IMF 才能够行稳致远。

关于当前这一轮改革性的问题，多年前 IMF 理事会的成员就商定了在 2023 年 12 月中旬之前要进行第 16 轮配额审查。从 1945 年到 2023 年 11 月中旬，IMF 已经进行了 15 轮配额审查。这种永久的金融资源，好像永久火药库，可以用其来帮助成员国。

三个星期之前，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IMFC) 决定在 2023 年 12 月中旬之前，有意义地增加永久资金额度。什么叫做“有意义地”增加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当前 IMF 有 10000 亿美元的贷款资金。其中，6000 亿是自有资本，即永久资本；剩下的 4000 亿借用资本来自一些债权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欧洲以及中国。IMF 把资金借给其他国家，然后向这些债权国借入 4000 亿美元。有意义地增加，可能意味着永久部分会增加 4000 亿美元，用来替代那些暂时借用的资本。

如果这种“有意义地增加”得以实现，将使 IMF 永久火药库更加强劲。但是，这仍然不够。因为整个金融钱包并没有比 10000 亿美元更多。虽然配额资金在增加，但治理结构依然没有变化。这个更大蛋糕的分配权仍然没有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当前的投票权和配额却更小了。例如，中国经济的权重已经是全球经济的 18%，但中国在 IMF 的投票权只占 6%，只有经济权重的 1/3。

我们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解决可信性和相关性的一部分问题，却没有办法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新兴经济体的权重增加了。从逻辑上来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配额和分配的调整来解决。IMF 理事会的成员需要在 2023 年 12 月中旬，在最终的决定中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最后的方法只能拭目以待，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是也需要保持客观态度。



“一带一路”：经验、挑战与机遇

- “一带一路”十年总结及展望 62
周建，IFF 顾问、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64
凯拉特·克林姆别托夫，IFF 理事、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前主席
- “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发展中国家 66
雷扎·巴基尔，安迈企业主权咨询服务全球负责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前行长

“一带一路”十年 总结及展望

■ 周建 / IFF 顾问、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周建

关于“一带一路”十年总结及展望，我主要讲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我们在“一带一路”的道路上已风雨前行了十年，我们应有一个目标，一个导向，指引大家一起朝这个目标前行。我个人认为“2035 年远景目标”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双碳”目标应该是“一带一路”重点推进的。“2035 年远景目标”是为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地区发展差异和公众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一个显著扩大、两个显著缩小”尤其应该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导向性的指标来共同推进。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7 月 6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中国

将为履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如果“2035 年远景目标”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有了着力点、立足点。我个人认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携手朝着这个目标推进。

第二，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都面临着若干重大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尽管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一带一路”国家，在产业能源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新污染物潜在风险和隐患方面（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以及环境质量与健康、生态协同保全养育等领域，都共同面临着多重压力；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是，在预判、应对、减缓环境生态风险隐患与其他变化的影响方面，“一带一路”区域的能力相对薄弱；第三方面的挑战是，在科技支撑、金融保障、监管能力、基础设施方面，掌握的方法以及支撑和保障能力相对薄弱；第四个方面的挑战是，生态环境基础十分脆弱，自我恢复的能力也相当薄弱，即山水湖田林草沙协同治理、保护养育及恢复能力相当薄弱；第五个方面的挑战是，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能力不足，基础设施的短板和欠账较多，抗风险、抗灾害、抗突变的能力亟待加强，绿色金融保障体系相关的政策工具欠缺。这些挑战是制约我们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障碍。

第三，“一带一路”区域尤其要关注的五个

方面问题。一是要关注该区域的特征优势，要充分考虑区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规划格局的整合、协调和完善；二是要关注自然资源领域的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合理开发和存量优化；三是要关注人和自然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协同保护养育并逐步将其纳入经济核算体系；四是要高度重视维系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格局；五是要关注持续增强对自然灾害、生态损伤和气候风险的适应、应对、防范和减缓能力；六是要着力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风险的适应性和韧性，推进工业、能源、农业、交通、城镇、建筑、物流和沿江海经济带的建设。

第四，我认为中国正在展开的以下六个领域的工作，对整个“一带一路”区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改革开放创新驱动。二是不断拓展绿色产业，包括绿色规划、设计、咨询、能源、交通、建筑、康养、医养、生态农业、集聚式服务业等。三是健全绿色金融，正确研判碳成本、碳关税、碳价格传导机制，关注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约束要素，对“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版图、地缘政治格局、能源产业分布、科技发展走向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目前中国在碳减排的积极举措包括：一是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完善碳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质控，确权分配计量核算体系；二是建立并完善碳金融、债券、基金、价格、融资、保险、证券、期货、碳自身抵押及其管理等相关政策制度体系。碳金融体系的建立对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启动 CCER 核证自愿减排机制，结合强制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共同构建异地、异域、异业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协同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减污减碳双控和能源消耗总量强度双控，以形成一个促进绿色转型的体系。四是推动普及绿色文化，促进绿色转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维系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双

碳”目标。

从历史进程来看，碳减排目前正处于关键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警告，实现碳减排的窗口正在迅速关闭。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测算，到 2030 年每年将约有 240 亿吨碳当量的减排缺口。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减排当前总量的 43%。遗憾的是，全球在很多领域的碳减排承诺可能会成为泡影，这是我们面临的一场大考，一场极其复杂的全球博弈，一场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艰难历程。

我们要抓住这个关键节点，倒逼工业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和优化升级，务必大幅地增加绿色投资，转变增长方式，拓展发展空间，构建生态气候安全格局，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另外，我们一定要守住、守牢生态安全底线、红线，构筑空间规划格局。中国已经向世界宣布：保障耕地不低于 18.5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 15.46 亿亩；陆域生态保护不低于 300 万平方公里，海域生态保护不低于 15 万平方公里。以上生态红线的坚守，是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务必要加以重视的。同时要持续强化生态监管和对环境安全、生态灾害和气候风险的防范、监控、排查、化解以及科学的处置。要保障生态安全和资源永续，特别是要维系代际公平，维持生态公正。

最后是要不断地完善和健全“一带一路”区域的生态养育保障体系，也就是说在法律法规、财政金融、科学技术等领域要建立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保障体系，以推进这个区域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 凯拉特·克林姆别托夫 / IFF 理事、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前主席



凯拉特·克林姆别托夫

整整 10 年前，习近平主席到访哈萨克斯坦，在首都阿斯塔纳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为“一带一路”）。中亚丝绸之路是一条非常传统的路线，它在那个时代把中国、中东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立刻受到了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涵盖了能源、安全以及互联互通和交通互联互通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哈萨克斯坦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一直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之一。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 2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在苏联时期，这是一条封闭的边界，我认为现在这里是通往中亚乃至东欧的重要入口之一。

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是世界上陆地领土面积第九大的国家。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道

路大多是南北向的，共建“一带一路”以来，哈萨克斯坦已实际修建了 2000 多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从不同方向与中国边境相连接，还包括连接里海和横跨俄罗斯联邦的北部走廊。

总体而言，我认为倡议助力哈萨克斯坦建立起了自给自足的网络，并将全球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欧盟真正连接起来了。就全球贸易而言，中国和欧盟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伙伴。另外，我认为在建设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到东部并直达中国边境的石油管道方面，哈萨克斯坦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亚和中国的连接。

中亚与中国之间的共同贸易额很快就将超过 1000 亿美元，习近平主席与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时谈到了这一点。“一带一路”这个名字中的“一带”是指横跨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路；“一路”是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水路。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东西方和南北部的桥梁。哈萨克斯坦不仅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还出口铀等矿产和农产品，贸易进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我们合作的重要成果。

在金融领域，我曾担任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行长，在我任职期间，达成了许多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使国际货币交易在哈萨克斯坦成为可能。7 年前，哈萨克斯坦建立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IFC)，AIFC 是具有独立司法管辖权的金融特区，适用普通法系。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中国金融机构，作为第一批参与者在哈萨克斯坦开设了分支机构。AIFC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丝绸之路基金（“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运营商）共同创建了新的证券交易所——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并尝试将哈萨克斯坦的资本



市场与中国的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在 AIFC 注册的 2000 多家公司中，有 10% 来自中国，即 200 多家公司。

我们坚信，中哈两国在金融互联互通和电子商务发展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也将大有可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 10 年来，中哈合作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果，我们还将再接再厉。我认为，应该公正对待“一带一路”倡议，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倡议，更是全球所有南部国家互联互通和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要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的原因。我认为，全球跨国金融组织也许并没有对亚洲的互联互通给予足够的关注。

当我们谈论互联互通时，应该不仅谈论交通的互联互通等有形基础设施，还应该谈论数字互联互通、贸易互联互通、电子商务互联互通、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互联互通。新冠肺炎疫情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全球南部国家之间的国际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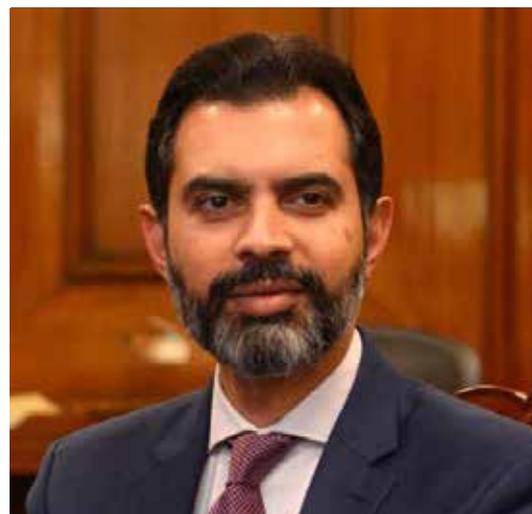
系，没有文化领域的国际联系，全球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上所述的互联互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带一路”倡议刚刚开始 10 年，也许我们可以在未来 20 年衡量其真正的成果。我个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非常乐观。

“一带一路”倡议，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倡议，更是全球所有南部国家互联互通和发展的机遇。

“一带一路”惠及 沿线发展中国家

■ 雷扎·巴基尔 / 安迈企业主权咨询服务全球负责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前行长



雷扎·巴基尔

在我谈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好处、面临的挑战，以及“一带一路”的十年经验等问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我是以一名“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国之一——巴基斯坦公民，以及该国中央银行前任行长的身份和角度发表看法的。我的一些观点也受益于我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 20 年的工作经验。在 IMF 任职期间，有四年我担任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政策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负责 IMF 所有和主权债务重组及债务可持续相关的政策。现在，我是安迈企业主权咨询服务全球负责人，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和解决他们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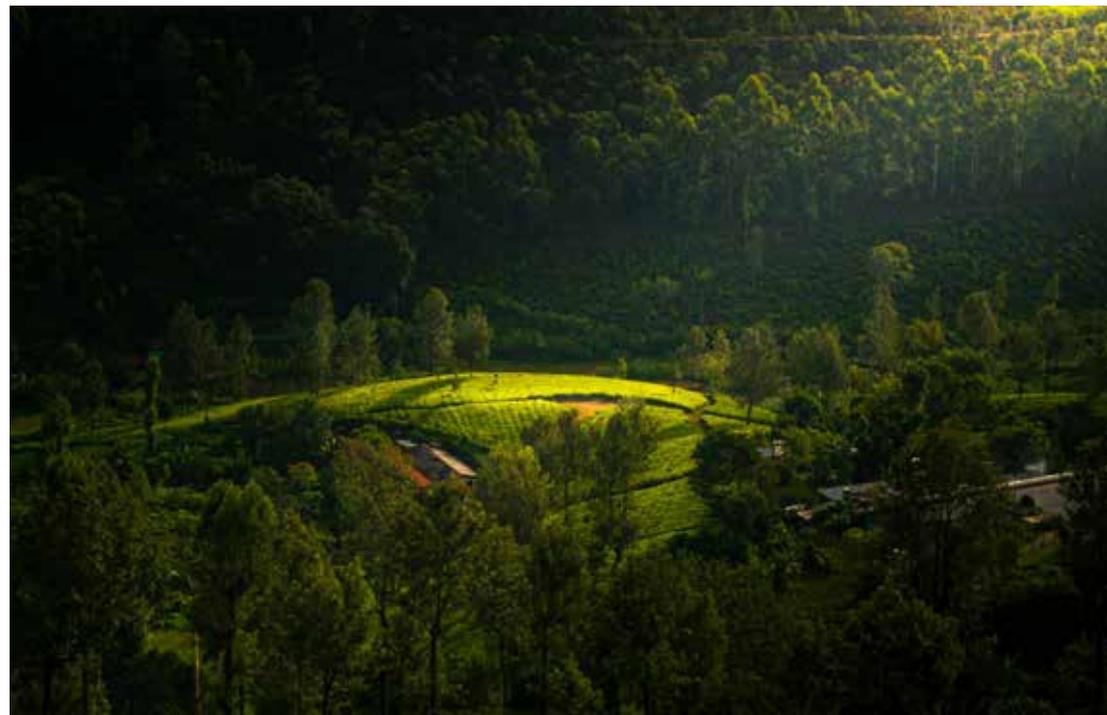
首先，请允许我从巴基斯坦公民的角度谈一谈我的看法。在巴基斯坦，我们常常说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朋友。这是一种外交说法，意思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是能够经受得住风雨考验的全天候友谊。众所周知，巴基斯坦是最

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关键项目。除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基础设施项目之外，我的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同事也提到，中国还通过中央银行的支持，包括互换额度和巴基斯坦中央银行储备中的存款，来为巴基斯坦提供支持。

我记得 2019 年巴基斯坦因面临国际收支危机，不得不就一项新的 IMF 融资项目与其进行谈判，IMF 要求申请人也要寻找其他融资渠道。我作为时任巴基斯坦央行行长，在寻求其他资金援助和融资措施时，中国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项目层面，还体现在国际收支层面，中国还帮助我们将 IMF 的项目进行了整合。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沿线及周边国家，这是来自于我作为巴基斯坦央行前行长的亲身经历。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二点看法，来源于我在 IMF 20 年的工作经验。“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关注全球金融，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其他债权国不愿提供资金的时候，填补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

回想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债务史，正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难以承受的水平，才最终有了“重债穷国减债倡议 (HIPC)”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MDRI)”，使得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得到大幅减免。西方国家是当时的主要债权国，实施债务减免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决定开始审查它们未来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供给。根据 IMF 的统计数据，1980 年，发展中国家从外部



债权人获得的官方转移净额平均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8%，而 2021 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 2%。

从宏观和全球层面上来看，在大多数西方债权人从发展中国家撤出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个缺口。因此，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没有“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会更加难以满足。而且“一带一路”倡议的贷款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即借款国在贷款人的选择上拥有选择权，不是强迫性的。如果你是借款人，有多方贷款人可供选择，这对你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我有时会在某些媒体上看到对“一带一路”担忧的言论，他们往往把自主选择 and 强迫混为一谈。我想说的是，对于借款国来说，有更多的贷款人可供选择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明确的利好选项，因为当他们有融资需求时，“一带一路”倡议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

从宏观和全球层面上来看，在大多数西方债权人从发展中国家撤出的时候，“一带一路”倡议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个缺口。而且“一带一路”倡议的贷款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即借款国在贷款人的选择上拥有选择权，不是强迫性的。

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挑战与机遇并存

■ 吴晓青 / IFF顾问、全国政协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



吴晓青

中国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也是未来的需要。回首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56789”。可见推动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

一、中国民营经济遇到的发展问题和成长困扰

当前，面对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内周期性结构矛盾交织叠加等诸多挑战，民营经济遇到不少发展问题和成长困扰。通过到多地调研考察，我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隐形壁垒多，区别对待大量存在，民企发展的活力受到制约；二是产权保护不足，民企的合法权益

受损，民企的安全感缺乏；三是融资难、融资贵、成本杂、税费高，民企经济负担加重；四是外部的干扰多、消费需求弱，民企的效率下降；五是民企因过度扩张，风险暴露，部分民企存在较大发展风险隐患。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应该从民企的外部 and 内部生态环境来分析。

首先，从外部生态环境看，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待改善。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准入不准营问题依然突出；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仍未健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力度需要加大，要素流动障碍多，对民企区别对待较为普遍；三是国有经济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分散在广泛的竞争领域，一些国企全产业链布局对民企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在一些地方甚至对民企参与投资给予另类、区别对待。

第二，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有待健全。一是立法上，相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保护的立法缺失，同时也存在同类行为不同定性、同类犯罪不同刑法的问题；二是司法上民企制约多，受众成本高、经营常受到调查取证、应诉挂案等压力，有的甚至因案致困；三是执法上，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选择性执法等等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有待加强。一是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系统性不够，一些地方落实政策要求不到位，单兵突进、九龙治水的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不足，诚信政府建设力度有待加强，比如，一些政策朝令夕改、变动频繁，一个地方一种打法，民企不

中国民营经济：创新与前景

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	69
吴晓青，IFF 顾问、全国政协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	
重视民营经济，实现全面繁荣	72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IFF 学术委员、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资深教授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振信心	73
余向荣，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知如何应对；三是政策落地的协同性、实效性不强，不同部门和地方利益和认识不一致，政策抵消效应明显，有的政策重制定轻落实，执行的弹性大。

第四，鼓励支持的舆论环境有待优化。一是一些地方不能正确认识甚至曲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劫富济贫，把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解读为限制民营经济，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解读为开计划经济倒车；二是存在恶意抹黑民企的现象，受非法利益的驱动，有些人蓄意炒作、造谣抹黑民企，向民企泼脏水，意图制造社会对立和恐慌情形；三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不够，一定要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理论研究。

其次，从民营企业内部生态环境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部分民企治理结构不尽合理。一是企业的治理不完善，部分民企股权结构和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公司现代化治理的需要，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等机制形同虚设，抵御重大风险能力偏弱；二是民企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有待加强，从近年查出的典型案例看，部分民企合规意识、法规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营商环境；三是民企内部腐败和大案要案问题突出。2021 年，民企内部腐败类型的案件占同类案件的 26.8%，除违法犯罪外还存在大量员工违规操作，出卖商业秘密，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舞弊行为。

第二，创新驱动发展重视不够。虽然从整体来看，民企贡献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但民企群体内部的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极不平衡。绝大多数民企的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半数左右的民企被认为在科技创新上无所作为，还有 1/4 左右的民企的科技创新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民企中仅有 26.94% 设有专职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仅有 6.68% 雇佣了具有国家级认定的人才，18.15% 雇佣了具有省级认定的人才，而无任何认定人才的民企比例高达 75%。

第三，民企的成长耐力和发展韧性亟待加强。民营企业家的代际传承一直是困扰民企可持续发展的大难题。目前民企正处于接力传承的高峰期。据中国企业家调查信息系统统计，63% 的民企正在进行企业传承，仅有 7.5% 的民企已完成交接，而已经培养好接班人的比例只有 8.7%。此外，许多民企风险管理意识和应对能力不足，只有 49.6% 的民企有应对危机的书面计划。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民企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不但没能彰显，反而显现出了企业的脆弱性，发展韧性和生存空间受到了制约，而人才问题，自始至终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二、惠民企、活民企、兴民企春风密集吹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为民企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明确要求，各部门闻令而动，在破除公平准入壁垒、保障平等获取要素、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众多方面接踵推出了一大批便于操作、含金量高的实招和硬招。特别是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以来，惠企、活企、兴企春风密集吹来。总体来说，近年来，对民企认识的高度、改革的深度、推动的力度前所未有的。

一是认识高度前所未有的。《意见》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新的发展定位更加显现出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

二是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的。《意见》在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等企业重大关心问题上拿出了实实在在的干货，随后相关部委在促进公平准入、强化要素支持等方面出台了细化措施，支持民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这一系列重要政策部署，足见中国振兴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三是推动的力度前所未有的。《意见》坚持刀刃向内，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压实各级部门

主体责任。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机构，加强政策统筹协调，推动重大政策落地，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必将强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活力。

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机遇

民营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春天来了，民营企业在新的赶考路上，要消除顾虑，抢抓机遇，大胆发展。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潜力、活力来看，以下机遇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看。2023 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总体回升向好，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一脉相承，唇齿相依。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堵点、断点、难点将得到有效破解。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将逐步缩小，可以预见一个有着超 14 亿人口、超 4 亿中等收入人群、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的大市场，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互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必然巨大。

其次，从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看。新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将持续释放发展的新动力，不断开辟发展的新空间。从创新发展的维度看，数字经济的蓝海在于数字化平台与生产场景结合。如果说中国消费互联网只能容纳几家万亿级的企业，那么产业互联网，将有可能容纳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从绿色发展的维度看，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蕴藏着大量的技术革新和产业机遇。2022 年，中国生态环保产业全年营业收入超过 2.2 万亿，而且 2011—2021 年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再次，从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来看。2023 年 5 月底，中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突破了 5000 万户，较 2012 年增长了 3.7%。解决企业难点、堵点问题是激发企业活力的关键所在。《意见》发布一年来，各有关部门在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必将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小企业是民营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将专精特新写入《2022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众多专精特新企业持续耕耘专业领域，对于优化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战略意义。

重视民营经济， 实现全面繁荣

■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 IFF学术委员、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资深教授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每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近 18.5 万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巨大，为确保其不会停滞不前，必须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中国已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将面临的挑战，并制定了更为有效的政策规划。这意味着需要重新实现经济的平衡，不再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而是更多地转向刺激消费。此外，还必须将那些低成本、低收入、低增值的制造业升级，转向高科技、高增值的产业。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要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惠及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还要惠及广大群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现在需要采取何种策略？我认为私营经济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外部环境长期来看对中国并不十分有利，因为地区冲突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加

剧。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更需要实现自给自足，刺激国内消费，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明显，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力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需要从重投资的发展模式，转向提高生产率、升级产业价值链的新发展模式，并把更多的服务业转向私营领域，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一直表现良好。民营企业可以更高效地推动创新、增加就业岗位，所以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提供指导，提供和营造更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环境，激励和促进其繁荣发展。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需要清晰地传递给民营企业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中国政府欢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成功，民营企业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

我们知道行胜于言，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中国欢迎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在实际行动中，一些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因此，政府不但要准确清晰传达出欢迎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后续行动也要能跟上，要有具体行动和措施确保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要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多地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金融市场、机制建设、依法行政、法治管理等方面的改进，对于民营企业以及市场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需要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及健全的框架，确保资源能够分配到最具有生产力的领域，产生最大的效益。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并采取切实措施，引导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于提振信心

■ 余向荣 / 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余向荣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基于我跟投资者以及企业客户的交流，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信心的普遍缺失，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缺失，这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举几个我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例，从中可见现在投资者信心缺失大概到了什么程度。例如，最近花旗银行公布了中国 2023 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GDP 增长了 4.9%，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这一数据公布之后，我们立刻接到了客户邮件，询问这个数据是怎么做出来的，随后接二连三类似邮件给我们发过来。然而，二季度我们公布 GDP 增速低于预期的时候，并没有接到类似的

询问。这种对于经济数据超过预期和低于预期非对称的反应说明什么？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大家甚至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底气接受经济数据超预期。

再比如，在日常工作与投资者包括企业客户的交流、互动中，有一类问题经常让我非常有挫败感。因为看空经济，所以大家经常讨论会不会出台政策。有一类客户会告诉你，政府非常有定力，所以不要对政策抱有任何预期。后来，有利的政策陆续出台，他们又会告诉你，政策虽然超预期了，但是政策不会有用。再后来，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他又说这个数据虽然超预期，但是它不可持续。

都说信心是黄金，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提振信心？我从市场的角度提三点粗浅的看法。

一、要趁势而上，稳住经济增长，这是当务之急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历，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一旦经济增速

下滑，很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而一旦看到问题，大家很快就会把很多长期问题短期化，聚焦到面临的诸多挑战上，而忽略了发展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导致信心进一步降低，于是弱预期就自我实现了。

中国完全有空间去实现更高的增长。三季度 GDP 增速 4.9%，这是实际增速，名义增速实际上只有 3.5%。换句话说，中国三季度实际上是通缩的情况，总需求是不足的，整个经济是运行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下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凯恩斯主义

因为出现了通缩的情况，所以导致大家对宏观数据的认知和微观体感产生了差异，这种现象就是所谓“温差”。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体会到的是名义增长，工资、奖金、企业的利润都是名义值，当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时，就会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不一致。

政策就有用，我们可以通过逆周期的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从而实现经济更好的增长。

因为出现了通缩的情况，所以导致大家对宏观数据的认知和微观体感产生了差异，这种现象就是所谓“温差”。在经济运行中，我们体会到的是名义增长，工资、奖金、企业的利润都是名义值，当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时，就会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不一致。从好的方面来讲，这也正说明了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之下，中国有足够空间去实现更好的增长。

我认为 2024 年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继续保持 5% 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对于市场、对于民营企业，对于包括住户部门都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即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稳定住经济发展。

从 2012 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 L 型的增长阶段。过去几年连续下调经济增速目标，实际上有一个信号作用，即政府对经济增长已不像以前看得那么重要，国企或者住户部门在做下一年预算的时候，是否应该参照政府的目标略微下调？如果是这样，其实它的增速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L 型增长趋势。十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到了 L 型增长的触底阶段？是否可以实现反弹？因此，2024 年定一个略高的增速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起到一个信号的作用。

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也未必特别的大。比如，在考虑了包括房地产、外需等各种困难因素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中国 2024 年的经济增长是 4.2%。在此基础上，要实现 5% 的增长，即从 4.2% 做到 5%，需要一万亿的额外 GDP 增长，需要的额外刺激也就百亿左右。

在接近 2023 年年底的时候，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一个一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既然 2023 年允许财政赤字对 GDP 的赤字率从 3% 提高到 3.8%，我认为 2024 年有必要，也有这个可能保持在 3.8% 的水平。所以，保持财政进一步扩张的态势，是 2024 年实现 5% 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必要手段。另外，准财政工具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房

地产的下行压力，政府可以主导城中村和公共住房的改造。怎么融资呢？类似过去的棚改项目，央行可以通过 PSL 把钱贷给政策性银行，然后通过政策性银行输送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房地产或者公共住房的开发上。

所以，财政和准财政双管齐下，2024 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速 5% 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解决很多问题的第一步，也有利于稳定信心。

二、多措并举，稳定资产价格

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面临的是通缩问题，而美国放开之后面临的是比较严重的通胀问题。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了 5 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但实际上，中国住户的存款规模也不小。据我们测算，中国住户储蓄额比历史最高值还要高大约 25 万亿元左右，这 25 万亿元的超额存款相当于中国一年零售总额的一半以上。如果把这笔钱花掉，就能转化为未来的购买力和经济增长。但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参与者没有消费信心呢？

我们考察了一下美国的情况。疫情放开之后，美国叠加了一轮创富周期，美国所谓“直升机撒钱 (Helicopter money)”的极端货币政策，导致它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均有大幅增长。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住户部门去杠杆做得也比较彻底。所以，美国住户部门净资产在疫情期间相当于翻了一倍，在此情况下，财富效应极大彰显，美国居民因而有信心、有底气花掉超额存款，转换为实际购买力。

2023 年暑期，中国会不会日本化，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中国和日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资产价格还没有崩，还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内爆。大家忧心资产可能崩盘，又怎么能有信心做进一步的投资呢？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基于以上所述实际情况，我提出以下两点粗浅建议以期有助于提升资产价值，从而稳定市场和企业的信心。

第一，要稳房价。香港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房价跌的时候，香港会收窄或者减少土地供应，以此来平衡供需关系。实际上，现在这一



轮房地产刺激计划在需求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下调房地产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认房不认贷、放松限购措施等等。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限购限售措施放开之后，房价会不会迎来新一轮大跌？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政府接下来应进一步平抑供需关系。有两点可以考虑：其一，结合前面讲的城中村改造，可以通过房票的形式补贴受影响的居民，增加对于存量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平衡房价。其二，要发展保障性住房。政府可以通过回购的形式，把一些原来的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从而平抑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实现稳房价的意图。

第二，要活跃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例如，我们觉得推出股市平准基金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目前外资、市场的情绪普遍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关键是怎么提振信心？如果政府主导的基金都没有信心，大家当然更没有信心。所以有的时候信心是自己给的，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平准基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要稳定政策的预期

疫情以来，包括之前几年，有些政策的变化让企业家有无所适从之感。大家并不指望多加一点利息或者在税收上多一点优惠、补贴，大家更希望看

到的是宏观的营商环境是持续的、可预测的。我完全同意进一步加强经济结构性改革，但我认为政策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和透明度是更加重要的。根据中国发展的经验，往往是一收就死，一放就活，我们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从监管环境来讲，其实我们需要一定的放松。中国疫情防控措施放开一年后，过海关的“黑码”才终于取消，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启示，即采用一些限制性措施很容易，但取消好像很困难。民营经济政策的收紧，是不是应该到下一个阶段了？推进构建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也是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坦率地讲，在资本市场其实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此类结构性改革政策很正确，但落实到具体执行上，还是会有很多问题。我要强调一个顺序问题，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经济持续向好，稳定住资产价格，避免一些后顾之忧。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推进结构性改革，一个比较透明的、可预测的、相对宽松的营商环境，对于提振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生产性服务业 与粤港澳高质量发展

■ 黄奇帆 /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



黄奇帆

今天会议的主题“大湾区与粤港澳一体化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包含了三个词：大湾区、粤港澳以及一体化。一体化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要找到粤、港、澳、珠三角的共性，这就是推动整个广东地区、港澳地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要点，即无论是大湾区还是珠三角，都要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当今世界，在高质量的终端产品中，45%左右是制造业产生的价值，50%~60%往往是服务产生的价值。这种服务深度地嵌入到了产品中，看不见、摸不着，比如手机作为一个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如果售价一万元，其制造成本为五六千块，而嵌入手机中的操作系统、软件、芯片里的程序，以及整个手机的各种专利、各种服务的价值可能占50%~60%的比重。

我们把这种制造品的服务内容叫做生产性服务业，从GDP角度考虑，可以分为十大门类。第一，

新产品制造工艺流程中所需要的研究、开发。第二，产业链中的物流配送、战略物资的平衡到位。第三，产业链当中的金融服务，包括产业链各种零部件的相互资金支持，以及整个产业链的金融清算、企业股票上市、抵押债券、各种租赁、REITs融通等，都属于产业链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第四，产业链成百上千个企业形成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规范，评估企业的准入标准，对零部件、产品质量提供检验检测。第五，产业链节能、绿色环保相关的保障服务。第六，产业链数字化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行业。第七，产业链中的各种产品包括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销售、贸易、批发，无论线上线下，都属于第七种生产性服务业。第八，产业链品牌的法律司法保障和专利品牌的推销、广告。第九，产业链售后服务，既包括产品的质量维修，也包括产品推出后的软件持续更新。这使得厂家不但能够持续收取客户费用，而且在5~10年后，客户与生产厂家仍会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客户一旦想要购买新产品，仍有较大可能继续购买该厂家的产品。第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链有大量的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这个产业链的“链头”企业、龙头企业，对几个生产性服务业完全掌控，通过整合产业链的外包服务，将一些相对单一的服务外包出去。

以上十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文化、养老、旅游、康养等十个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即上文讲的十大门类，构成了一个国家服务业的重要组成板块。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粤港澳高质量发展	77
黄奇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	
“湾区标准”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80
梁维特，IFF 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前司长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背景下的澳门定位及发展方向	82
叶兆佳，IFF 理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	

对发达国家来说，例如美国，服务业占 GDP 的 80%，有些人将其形容为“脱实就虚”，是“虚胖”，认为其服务业占比太高，制造业占比太低。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美国的服务业 70% 是生产性服务业，即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这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体服务业中占比 70%，在 GDP 中占比 56%，也就意味着美国 GDP 的 50% 以上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的灵魂、制造业的附加值、制造业的生态、制造业的各种价值所在。正因为美国掌控了这部分产业，它将制造业放在全世界，其他企业和国家为它打工，效益的百分之四五十乃至七八十仍然属于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制造业的经济力量所在，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了 GDP 的 50% 以上。

再对比欧洲，欧洲制造业占 GDP 比重大约为 12%，加上非制造业的工业有 6 个百分点，总占比达到 18%。除去农业，欧洲的服务业占比为 78% 左右，而其中大约有 50% 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因此，欧洲 GDP 的 40% 左右为生产性服务业，这也是欧盟 27 个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依仗。

对比分析中国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大约为 27%，非制造业的采掘业占比 10 个百分点，加在一起 37%，再加上 6 个百分点的农业达到 43%，剩下 57% 是服务业。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服务业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只占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 57% 的服务业中仅有十七八个点是生产性服务业。

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 50% 以上，欧洲占 40% 以上，而中国只占不到 20%。显然，

相较于欧美的生产体系，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最薄弱。未来中国要强大、要崛起、要进一步发展，至少应该让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7% ~ 18% 上升到 30%，同时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占比，不像美国、欧洲那样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阻挡。

这也符合中国的长远规划，中国政府明确表达，中国制造业在“十四五”到更长远的期间，比重不低于 25%，最好是在 25% ~ 30% 左右，即中国的产业重心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同时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中国经济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占比要有所提高。提高到多少？至少提高到服务业的 30%。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 57%，生产性服务业要提高到服务业的 30%，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服务业的占比要达到 50% 以上。

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服务业中的占比，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相较于欧美的生产体系，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最薄弱。未来中国要强大、要崛起、要进一步发展，至少应该让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7% ~ 18% 上升到 30%，同时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占比，不像美国、欧洲那样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阻挡。

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贸易大国，货物贸易大国，但不是服务贸易大国，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已有 12 年。但是货物贸易大国不等于贸易强国，贸易强国必须是服务贸易大国、服务贸易的强国。中国现在服务贸易尽管有 7000 亿美元，但 1500 亿美元的出口主要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出口；而中国每年 5000 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则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进口。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生活性服务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比如宾馆、旅游接待，包括各种风景区的接待，附加值较低。而中国每年 5000 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进口，往往是生产性服务业，属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附加值也比较密集的行业。由于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较弱，国际竞争力更弱，因此中国每年 5000

亿美元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大部分来自于国际公司，即使是在中国的宾馆里待着，专门针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但由于公司注册在国外，因此也属于境外服务贸易的进口。

如果中国国内生产性服务业能力较高，在国内的生产、运营，可以提高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一旦跨国，则将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从 2020 年起，中国已连续四年召开了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其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能力，而服务贸易能力提升的基础就是要把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搞上去。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提高代表了高质量制造的效益和价值。例如苹果公司在中国一年生产 1.7 亿个手机（在广东生产 7000 万个，在郑州生产 1 亿个），苹果手机在国际上的售价为 1000 美元一个，因此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一年销售额为 1700 亿美元。因为中国制造综合成本较低，苹果手机的销售利润率为 40%，也就是一年约有 600 多亿美元的毛利，毛利的四分之三属于苹果公司，也就是苹果公司可以拿走 600 多亿中的 500 亿，只有 100 多亿留给中国的制造企业。中国制造企业有 1700 亿的销售池，有 100 多亿的利润，销售利润为 10%。某种角度来说效果是不错的，因为中国制造在国内平均的销售利润率是 7%，做苹果的制造则可以达到 10%。

但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公司在中国没有出一分钱投入生产线或做固定资产投资，也没有进行任何一个硬件的制造，更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流动资金采购零部件，却拿走了 75% 的毛利。因为它是整个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业的创造者，产业链的研究、开发、专利由它掌控；产业链物流配送、战略物资的到位，由它管理；产业链的金融清算，由它运营；产业链的绿色环保、数字赋能、自动化流程，由它开发；更进一步，产业链的全球贸易批发、销售以及产品售后服务同样由它管理。简而言之，产业链上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都是由苹果公司管控，所以谁掌控生产性服务业，掌控

产业链的生态、基础和运营，利润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就属于谁。

据统计，2022 年美国的 GDP 为 25 万亿美元，但是美国跨国公司由于掌控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控制着制造业和各种行业，从而可以拿走这些企业的利润、专利和服务收入的一半甚至 70%。而被拿走的利润都是当地国家的 GDP，例如中国 GDP 尽管有 120 万亿，中国工业的 GDP 也有几十万亿，但是中国工业 GDP 中的许多利润通过跨国公司的专利、服务和跨国公司的股权、资本运作被拿走了。但是 GDP 却仍然算在中国，所以中国才是“虚胖”，而跨国公司拿走的这些钱并不算在美国 GDP 里，只是统计 MP 的时候才会计算。所以我要强调，生产性服务业体现了一个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益价值，因此至关重要。

对粤港澳来说，香港作为世界的一个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专业服务中心，有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即以上所说的十个方面，除了制造业科研开发这个方面弱一点，其他的八九个方面都很强。比如：2022 年，香港的服务贸易占其进出口贸易的百分之六七十，包括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粤港澳制造业，香港不一定牵头，但是服务贸易和专业服务、生产性服务，在粤港澳大湾区需要由香港牵头引领，广州、深圳相配合。广州市的制造业占全市 GDP 的 25% 左右，广东省的制造业占全省 GDP 的 27% ~ 30% 左右。推动粤港澳高质量发展，需要粤港澳能够把生产性服务业和广东的制造业融合在一起，这至关重要。

“湾区标准” 助力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

■ 梁维特 / IFF 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前司长



梁维特

2023 年 4 月，粤港澳大湾区公布了 110 项“湾区标准”，我将以“湾区标准”为切入点，谈论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想法。

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月，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布了 110 项“湾区标准”。为了让“湾区标准”进一步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宣传 110 项“湾区标准”，提升能力，既要能够充分理解使用“湾区标准”的意义，也要具备符合这一标准的能力。由于“湾区标准”是一个倡导性的，非强制性的标准，所以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使用。因此不难预料，部分企业由于受限于自身条件，跳不出惯性思维，主动创新乏力等原因，会对“湾区标准”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

因此，我建议各地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做好有关宣传工作，让业界更充分地理解使用“湾区标准”的意义。这不仅能够让他们进一步扩大自身产品，提升在大湾区的影响力以及辐射力，也能够助力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发展迈向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以及针对性的措施，对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进行帮扶，以让更多企业自身具备符合“湾区标准”的能力。

第二，不断跟踪动态，提高业界对“湾区标准”的认可性、认同性以及“湾区标准”在社会的普及性。

“湾区标准”作为新生事物，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新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迅速研究并采取措施，尤其是要优化行政程序及时解决业界新出现的问题。政府在实施“湾区标准”的同时，要通过不断跟踪，及时了解业界在使用“湾区标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通过听取业界相关建设性的意见，优化相关政策措施，才能够让“湾区标准”得到业界更广泛的认同。只有当业界对“湾区标准”高度认同时，才能更好地在整个社会得到普及。

第三，总结经验，适时研究。通过法律手段，为“湾区标准”的实施提供重要的保障。达成共识是需要时间的，当各方对“湾区标准”形成共识后，就需要为这个标准提供有力的保障。

当“湾区标准”获得业界高度认同，并在社会广泛普及后，政府应适时研究制定“湾区标准”方面的相关法律，为“湾区标准”的实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有两个“共识”尤其重要。首先是当地内部



的共识。粤港澳大湾区涵盖 11 个城市，只有各个城市的不同关联方、不同力量均对包括“湾区标准”在内的创新性事物以及政策凝聚起共识，才能够产生共同的行动纲领，并在当地落实好相关的政策。其次就是区域之间的共识。由于粤港澳三地各有自身的发展定位，因此，在当地凝聚共识之后，三地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整合各自的力量，继而达成区域的共识，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以统一的行动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简而言之，没有力量的共识，就没有共识的力量。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契合我们国家以及大湾区的发展。展望未来，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助力我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关于黄奇帆市长谈到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也想尝试举一个不成熟的例子。比如在粤港澳科技方面，广东拥有大量的产业和有关人才，所以在创新科技、产业推动、学术研究、技术研究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所以它能够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科技金融方面发挥更强的作用。

创新科技就好像一部汽车，我们有科技作为

引擎，有金融作为能源，那澳门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我们的专利，我们的 IP，我们有关创新科技的服务业，这些方面澳门能不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大湾区跟全世界湾区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两个制度，我们怎样利用大湾区有效地把中国效率、中国规模跟国际规则、国际联系进行有机结合？在这方面澳门可以发挥一定的精准联系的功能，尤其是在 IP 和知识产权方面，科技服务业这台车我们已经拿到驾照，准备上路！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背景下的 澳门定位及发展方向

■ 叶兆佳 / IFF 理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



叶兆佳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发布 4 年，其中澳门发展的定位非常清晰，简称“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基地。总的来讲，澳门仍然以服务业为主，因为以上三个都是服务业，其中旅游、文化交流也不是黄市长提到的生产性服务业，只有中葡商贸服务平台可能涉及一部分，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国家给澳门的一个清晰定位。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举措，其中提

到“深合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四个定位也很清晰。澳门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新平台、澳门居民生活的新空间、“一国两制”的新示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高地。把“深合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先试区，或者说是离岸与离岸之间制度创新的一个试验田，先试先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的作用非常大，澳门在发展过程中怎么契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发挥联通世界的作用？从二十大报告或者说两会之后，对澳门的要求比以前更高了，不仅要保持繁荣稳定，还要发挥联通世界的作用。所以澳门政府一直在思考怎么根据国家的需要，做出澳门的努力。比如，金融在澳门有一定基础，并且可以发挥作用联通世界，跟香港起到互补的作用。

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提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规划（2024-2028 年）》，是中国澳门 2024—2028 经济适度产业多元、产业适度发展的规划。其中包含“1+4”，“4”里面又新

澳门发展的定位非常清晰，简称“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并存的交流基地。

增加了四个，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健康产业发展，以及现代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目标很清晰，就是丰富金融业态，促进澳门适度多元，最重要的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所需，发挥“一国

两制”高度开放金融体系及对接国际特别是葡语国家的优势，与其他地区实现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发挥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作用，做好连接海内外市场的桥梁，以服务国家所需，



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它是国家战略的延伸和实现的方式。

澳门怎么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其实有着几个方面联通世界的主要目标：一是加快培育澳门的债券市场；二是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三是鼓励跨境投融资。

债券市场于 2019 年在澳门开始发展，发展速度较快，在澳门债券市场挂牌的有 3000 多亿债券，发行量还不是很大。下一步澳门发展债券市场的目标是进一步丰富参与者和投资者，包括和香港以及欧洲的清算中心进行连接，丰富投资者的主体和发行者的主体。同时澳门债券市场以绿色发展作为主要基调，与香港和欧美市场实现了错位发展，香港债券市场是一个美元市场，而澳门想发展的则是一个人民币的债券市场。

在财富管理方面，澳门以基金业务为主。“深合区”的金融业务一直以基金业务为主，合计 600 多家基金公司，澳门现在也在推行信托法、基金法、证券法（澳门特区政府重新修订了《金融体系法律制度》，该法律已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获立法会细则性通过，并于 1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希望在澳门能够建立更多的基金公司，使金融进一

步蓬勃发展，这样除了银行之外还能汇集更多资金，支持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科创企业需要一些技术创新，通过基金的对接，以及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的对接能够把海外的基金吸引来支持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当前澳门想发展的一个方向，有关的法律、基础设施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另外澳门还有财富管理的发展方向，即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企业的资产大概有 30 万亿美元，海外华侨华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家国情怀，希望回到国内投资，但到内地投资会面临一些障碍，因此现在这部分华侨倾向于将资金投入新加坡。澳门目前正在思考如何与这些华人华侨的资金进行对接，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风险管理的要求，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澳门作为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更容易吸引海外资金，再通过港澳，以基金的方式回到内地，支持大湾区的发展。因此澳门在这方面存在潜力，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在金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数字化转型有效助力 普惠金融发展

■ 李东荣 /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李东荣

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从2013年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谈论普惠金融的发展，而今年恰好是普惠金融发展迈入第十个年头。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当然，我们在实践中可能更早就开始了相关工作，但作为国家战略，这一概念在该文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因此我们将2013年视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历史起点。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是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在该峰会上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高级原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普惠金融成绩斐然。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为构建高水平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其中明确强调要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包括提升普惠金融科技水平、打造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以及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服务覆盖面逐步扩大，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逐步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各种发展成果中，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崛起是值得大家关注和思考的。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各个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中的应用。目前，中国的电商金融、移动金融、在线供应链金融等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在直达性、适当性和匹配性方面的边际改善。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普”字问题。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操作，我们克服了许多限制，不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客观因素的束缚，这使得金融的血液持续流向更深、更广的经济末梢神经。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稍微薄弱，但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即使在中国的农村、山区，包括海上边远的地方，也能够通过移动金融打通网点和人力无法到达的“最后一公里”的制约，解决欠发达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破解普惠金融中“惠”的问题。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运用，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实现

数字化转型与普惠金融

数字化转型有效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85
李东荣，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	88
亚历山大·通比尼，IFF 顾问、国际清算银行美洲首席代表、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	
数字金融变革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	89
安顿·马斯凯特里爵士，IFF 学术委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效地降低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使小微企业、“三农”等服务对象能够获取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最后，可以有效地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可以实现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场景与流程有效整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要素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如今我们可以注意到金融机构线下网点的变化，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线下网点内的人流稀少，有的网点只能见到金融机构的员工，而客户大多通过网络在线与金融机构网点联系完成服务。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金融在帮助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供需不匹配等老问题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风险治理的挑战。众所周知，金融业天生与风险紧密相连，它的基础是信用风险。因此，防范与化解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即使在数字时代这个命题也不会改变。所以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会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和负外部性的特征，但在多维开放和多项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这样的新时代技术背景下，金融风险、技术风险和网络安全更容易叠加和扩散，使得风险传递更快、波及面更广，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数字鸿沟的挑战。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始终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各类人群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然而，在数字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人群在金融服务改进方面的感受和需求存在差异。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居民和低收入人群，若缺乏足够的数字技术和技能，就容易在数字技术金融应用方面产生数字鸿沟，导致他们在金融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能力出现分化，甚至可能产生一些恐惧。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针对不同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给予关注。比如，老年人可能面临视力不佳和不熟悉新工具应用等问题，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金融服务方面产生不同的体验。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都应对改善老年人和其他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体验做出回应，并进行必要的改进。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一些弱势群体对于传统线下服务网点的依赖仍然存在。一旦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线下网点，可能引发一些技术性的金

融排斥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第三，监管适应性的挑战。由于金融行业涉众性广，经济利益直接等特点，它需要强监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行业的相互融合，数字普惠金融的跨界、跨业的特征愈发明显，这就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综合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加强监管协作与信息共享。在监管资源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模式众多、创新速度快，给监管人员、监管工具、监管体制和监管机制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总而言之，数字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之路还需要进一步科学规划，这里我提四点建议：

一是要着力推动数字技术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农村等欠发达地区是数字普惠金融要着力的重点领域，因此金融机构要更深入地了解农村地区的特点和广大农户的金融诉求，积极探索应用先进技术，实现更高效的风险评估、信用评估和客户服务，了解农户的金融需求和行为特征，开发适合他们实际需求的各种风险评估模型和信用评估工具。总而言之，通过我们各方面的努力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当的支持。

二是着力丰富适老化和无障碍金融服务。数字工具的使用对一些人而言，如果安排不当可能会让他们产生恐惧，所以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金融系统要加快数字渠道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功能升级，鼓励支持金融机构研究推出覆盖面广、无障碍、功能丰富的智能产品，拓宽数字技术在信息无障碍领域的应用场景，探索形成互利共赢、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要发挥传统服务渠道的兜底保障作用，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避免扩大数字鸿沟和技术性金融排斥，助力保障老年人和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融入现代金融生活。

三是着力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安全规范管理。在数字技术应用之后，将更大范围地涉及用户

的个人信息、商户信息及市场信息。特别是随着算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样化的数据算法会带来更为复杂的数据安全管理要求。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加强风险管理和安全保障措施，保障数据安全性并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金融机构应健全数据安全规范管理体系，通过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手段保护数据的隐私安全、降低数据泄露风险，保障数据在整个系统中顺畅流转和高效运行。总而言之，数据广泛应用是一个发展趋势。最近国家数据局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对此的高度重视。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数据信息产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完善数据安全规范管理。

四是着力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跨界特征明显，业务模式众多，创新速度快、服务涉众性强，给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在业务规范、技术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监管规则和体系建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实现规则的数字化转型、数据实时采集、风险的智能化分析以及结果自动化处置等功能。这样，监管部门就能在新时代对各类创新做到看得懂、穿得透、控得住、管得好，同时要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建设，优先考虑将更多的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纳入监管沙盒的测试范围，以鼓励从业机构更主动、更积极地开展有普惠价值的金融创新活动。

未来中国金融普惠事业将从注重扩面增量转向注重提质增效的更高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会更加凸显，其舞台也更加广阔。让我们共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探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也推动全球数字普惠金融事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 提供支持 and 动力

■ 亚历山大·通比尼 / IFF 顾问、国际清算银行美洲首席代表、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



亚历山大·通比尼

全球中央银行将普惠金融以及利用数字化保障和推进普惠金融，视为其重点工作之一。普惠金融旨在为全体民众提供更多金融工具和合理价格的金融产品，以提升社会群体的能力，并为私营领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and 动力。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见证了数字革命和大数据的发展以及支付、信用保险和财富管理的激烈竞争，这重塑了金融格局以及我们与货币和金融服务的互动方式。这些新需求已经引起了央行的关注。各国央行已采取了新的措施应对普惠金融的需求，例如在海外支付系统开发和货币发行方面。其中，数字支付系统的开发和提升是央行的一个重要做法。我也想谈谈拉美地区，特别是巴西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2020 年，巴西央行推出了第一个数字支付系统——皮克斯 (PIX)，召集了 700 多家银行为

客户提供实时转账服务。PIX 系统推出后，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有 67% 的巴西人已采取或正在接受线上和线下混合的交易。全民在数字支付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普遍提升。在许多场景下，数字支付的情况不断增长，正在逐步取代现金支付。在 PIX 系统落地后，银行在两年内吸引了 4000 多万人使用数字支付。据估计，在巴西约 2.2 亿人口中，有 5000 万人进行了首次数字支付。

不仅巴西在推广数字支付，中国等其他国家都在积极推进数字支付。在新兴经济体中，数字支付已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短短七年内，发展中国家数字支付的普及率已经从 35% 提升到了 57%。数字支付能够有效支持经济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普惠性，使更多居民和家庭能够参与普惠金融消费。此外，信贷控制也在逐步放宽，这对一些传统领域产生了影响。

国际清算银行 (BIS) 进行了一项研究，其中一篇论文提出了新兴经济体数字金融的提升对生产率的积极推动作用。该研究表明，数字支付的使用率与全要素增长率相关，数字支付使用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有效推动全要素增长率提高 0.04%，对人均 GDP 增长的拉动效应可达到 0.1%。数字支付也与非正规就业率下降以及拓宽借贷渠道相关。

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可以帮助民营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同时数字支付的普及也有助于正规和非正规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些研究也揭示了城乡差距和数字鸿沟。例如，在美国，金融科技公司的就业率较高，但在某些金融科技领域可能出现问题，特别是金融欺诈等风险，而采用数字支付方式可以规避一些风险。

数字金融变革 推动中小微企业发展

■ 安顿·马斯凯特里爵士 / IFF 学术委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安顿·马斯凯特里爵士

过去十年来，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巨大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则加快了这一进程。数字金融确实改善了金融服务的获取和使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决策、收付款、借贷和储蓄的方式。这是一场重要变革，因为它使个人、小企业和新兴经济体跨越了金融发展的多个阶段，进入了数字金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和小企业不再伴随重大风险和交易成本的现金交易，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产品，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

十年前，麦肯锡公司在 2014 年通过世界银行全球 Findex 数据库发布了一份关于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变革的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在南亚，53% 的人口被定义为金融排斥者（指社会中没有能力进入金融体系并获得必要金融服务的群体）。非洲和中东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61% 和 59%，东南亚为 59%，中国为 21%。此外，还存在性别影响，

因为有 50% 至 57% 的妇女和 56% 至 71% 的农村人口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同样查看世界银行全球 Findex 数据库可知，2021 年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全球 76% 的成年人口都能在金融机构或移动支付提供商处开户，比 2014 年增长了 25%。发展中经济体的变化更大，71% 的成年人拥有数字金融账户，相比 2014 年增长了 30%。

金融的包容性对减贫至关重要，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消费风险、促进经济增长。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项研究，特别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发挥作用。他们发现，数字金融普及率如果能够达到 75% 左右的水平，那么年经济增长率将提高 2.2%。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包括提高生产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影响。实际上，这并不包括金融科技信贷对投资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库。因此，数字金融普及率对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可能高于 2.2%。

尽管情况非常乐观，但我认为仍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展并不一致。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像乌干达、肯尼亚、博茨瓦纳、加纳和其他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也有许多国家进展还不够。其次，一些国家的所谓“社会规范”对金融技术的使用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像使用手机，就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妇女使用手机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事实上，最近一项研究指出，影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发展的不仅仅是金融机制的问题，也有诸如产权保护、监管适度 and 腐败控制等因素。

关于供应商在提供金融服务中的作用，麦肯锡公司最近在非洲发布了一份报告，内容是 2020 - 2021 年间金融科技公司的增长对商业基础的影

响。非洲的科技初创公司数量增加两倍，达到约 5200 家，其中近一半是金融科技公司，它们是金融服务的真正供应商。据估计，2020 年非洲金融科技公司的收入约为 40 ~ 60 亿美元，在这些国家的平均渗透率约为 3% ~ 5%。它们正在与全球领先企业并驾齐驱，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各国的数字金融普及率不尽相同，在实现规模化方面还存在挑战，例如一些市场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此外，还存在身份识别覆盖面不足和支付轨道有限的问题，而支付轨道是数字转账的支柱。

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方面，CBDC 的优势在于无需银行账户即可使用，这使其能够惠及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仍没有数字金融账户的人口。CBDC 交易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直接提供的数字钱包，也可以通过网络供应商或微信平台进行。它们也不要求最低余额，因此可以惠及收入较低的人群。CBDC 还有助于克服正式身份识别问题，这对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障碍，因为“了解你的客户”

(KnowYour Customer, 简称 KYC) 规定是尽职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它还能帮助最贫困的潜在客户，也就是那些难以核实数据尚未实现金融普惠的剩余人群。最后，CBDC 还可以提供离线功能，这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很有帮助，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此外，CBDC 还可以为非智能手机用户设计 CBDC 钱包和储值卡，这一点非常重要。

CBDC 钱包系统还需要提高征信和信用体系的质量，如巴西、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我认为 CBDC 的合法性是否能够得到不同国家和行业的认可，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有时一些私营企业或部门对 CBDC 持有怀疑和保留态度。此外，一个国家要确保金融诚信度、预防洗钱，并能够整合私人银行的运作等等，这些都是当前面临的问题。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金融 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国际金融论坛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國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廣州·上海·香港·華盛頓